



中國[illegible]近代史研究所[illegible]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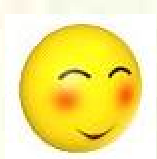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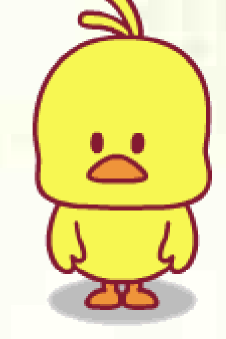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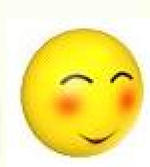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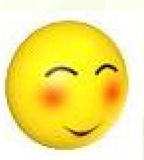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陈 公 博 著

韦 慕 庭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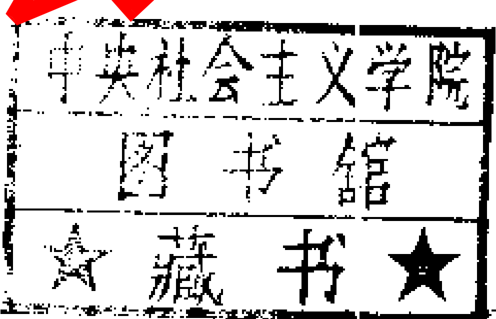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宜昌市新华印刷厂排版
岳阳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11千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0册

统一书号：11190·088 定价：0.50元

内 部 发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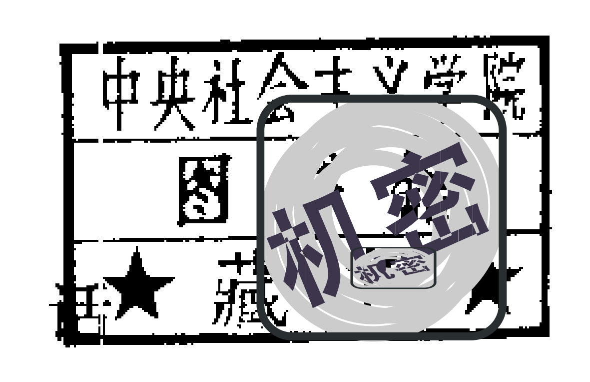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An essay written in 1924 by
Chén Kung-po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Martin Wilbur

Octagon Book
New York 1979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60年版翻译
根据纽约美克特贡出版社1979年版校订



译 者 的 话

这本书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写的硕士论文，内容是论述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篇论文从1924年起，一直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直到1960年才被发掘出来。论文出版时，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韦慕庭（C·Martin Wilbur）为它写了长篇绪言，连同论文一起发表。这本书是根据1960年的版本翻译的，校订时利用了新到手的1979年的版本。

陈公博的论文提供了关于二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新资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长期不为人所知的文件，以及他个人的回忆和结合这些文件所作的论述，因此，这本书发表后受到国外研究中国革命史的人们的重视。

韦慕庭的绪言就是根据陈公博所提供的资料写成的。这篇绪言对陈公博在论文中所提到的若干事实作了考证和探索，如对党的一大召开的日期的考证；对于党从一大时的关门政策到二大时的与国民党合作的变化过程的论证；对于一大时党内所争论的问题的探讨，以及对一大党纲与二大党章、一大决议案与二大决议案的对比研究，等等，这些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韦慕庭的论述，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陈公博的论文所附的六个附件中的四个（附录一、二、四、五）在我国长期散失，不为人们所知晓，1960年发现陈公

博的论文时，这四个文件也只有英文译文。当时韦慕庭论证了这些文件的可靠性。最近几年这些文件才被陆续发现。由于陈公博的论文与韦慕庭的论述很多地方涉及或引证这四个文件，故将这四个文件附在本书之后，便于读者参阅。其中附录一、二无中文原件，是译者根据陈公博的英文译文回译的；附录四、五采用了最近公布的中文原件，只对陈公博英文译文的个别错漏加了注释。其他两个附件早已为人们所知，故从略。

陈公博是党的一大的参加者，1925年从美国回国后参加了国民党，后来一直追随汪精卫，终于走上了坚决反共的道路，乃至最后堕落为大汉奸，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被处决。对于陈公博这些后期的历史，韦慕庭只作了客观的叙述。如果我们看看陈公博收在《寒风集》中的三十年代以后所写的回忆录，就可知道，当他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时，即已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赴美留学后又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持反对态度。所以陈公博后来走上反革命道路，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毫不奇怪。不过这本书所提供的，是党的早期活动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并不因陈公博后来所走的反革命道路而失去价值；从研究历史的角度看，也不能因人废言。所以对于陈公博后期的历史，只需在这里指出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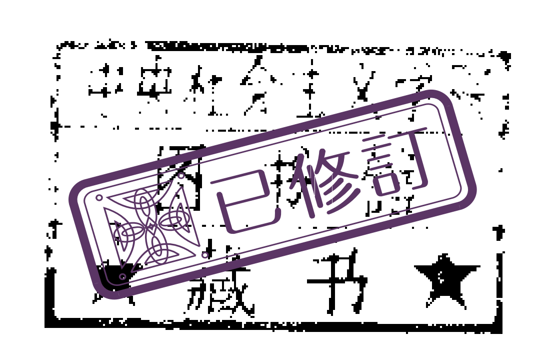
林　海

1981年5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绪　言（韦慕庭）

第二部分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陈公博）



第 一 部 分

绪 言

韦 慕 庭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仅两年半之后，曾在1921年7月参加过创建共产党的大会的一个成员陈公博，写了一篇名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这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这也许是现有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的历史记载。三十多年来，它一直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是未曾引人注意的一部书稿。

这篇论文所以使我们感兴趣，不仅是因为作者提供了不久前他所参加的那些大事的迄今不为人所知晓的若干细节，而且也因为它显露了一个曾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影响的中国青年民族主义者的思想。这些思想可能表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早期许多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思想观点的特征，从而为我们提供了瞭解那个时代的一种途径。这篇论文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在附录中包括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那几年的六个文件的译文，其中四个是迄今发现的任何其他资料中所没有的。这四个文件是：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

《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1922年）

《中国共产党组织章程》

附录中的其他两个文件是已知的，也是真实的。

这篇论文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尚未被历史学家所引用，是独立的证据，能够用来检验所发表的其他记载的可靠性。

陈公博是什么人？在写这篇论文时他的经历是什么？我

将就我所知道的背景材料，对这篇论文所提供的情况作出说明，然后我将对他所提供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那几年的情况给予评价。

许多朋友都曾对我的这一研究给予帮助。霍华德·林顿先生第一个使我注意到陈公博的论文。夏连荫女士对这篇论文的初步评价支持了我对它的重要性的信念。何廉教授使我与陈的家族的一位成员接触，这位成员许可我发表这篇论文，并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些问题的回答　唐德刚博士和苏珊·汉·马什博士向我提供了有用的传记材料和历史材料，唐博士还以鉴定的眼光读了原稿，并作了若干有益的更正。纳撒尼尔·B·塞耶先生为我提供了日文传记材料。张国焘先生给我弄到一本《寒风集》，罗伯特·伯顿先生让我参看并引用了张先生回忆录的手稿。罗伯特·诺斯教授和吴文津先生协助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进行研究。约翰·哈泽德教授对其中的几个文件提供了内行的见解。对所有这些朋友，谨致以衷心的感谢。由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这本书才得以出版。







一、论 文 的 作 者

A、陈公博早年生活概况

1. 陈公博的青年时代

关于陈公博的早年生活，已发表的材料，除《寒风集》所提供的以外，是不多的。《寒风集》是陈公博在不同时期所写的回忆文章和文学作品的文集，于1944年10月出版。① 关于他的传记的资料，中文的、日文的和英文的，都充满了矛盾和错误。例如，大部分传记资料把他的生日说成是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但确切的日期大概是1892年10月19日。②

他祖籍是闽南上杭，他的祖先已移居到广东西北的乳源。他家是客家人。陈公博的祖父迁居广州，不过老家仍在乳源。他父亲陈致美是个武官，曾在广西当过提督，于1895年辞职或被解除职务。他是一个反满三合会的首领。1907年他带着陈公博从广州移居乳源。在那里他图谋造反，1907年反叛垮台，陈致美被捕入狱，直至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才被释放。他于1912年9月去世。③

陈公博的童年是幸福的。他接受经书传统教育，还受传统的武术训练，并练习骑马。他阅读中国小说和历史。十五岁时他学习中断，帮助父亲进行秘密通信，同时他还设法补习英文。1907年他父亲的造反计划被发现后，他赶忙奔赴香港，避开他父亲所受的惩罚。在香港，他为一家革命的中国报纸当校对，偶尔也写些短文章。1908年夏季，他返回广州，

但他的家庭已处于困顿境地：父亲入狱，母亲患病，收入实际上等于零。靠着几个朋友的帮助，靠着养猪和打零工，陈公博才得进入一个新学堂育才书社，学习英语三年。他还当家庭教师，替人补习英语。这是经济上非常困难的时期。④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陈公博的父亲被释放出狱，被选为省议会议员，并被任命为都督府的军事顾问。陈公博被选定为县议会议长，并当了一支革命军的参谋。当时他只有二十岁，年轻气盛，趾高气扬。他父亲叫他放弃这些职位，到学生军入伍当兵。他在军队里只呆了几个月，对这一段经历十分厌恶。学兵营解散后，他在他的母校任教两年半，然后于1914年进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他靠做通讯员维持生活。1917年他从法专毕业，但不满足于所受的教育，遂决定到北京学习哲学。是年夏季，他动身前往北京。⑤

⑬

2. 在北大学习

国立北京大学在1917年1月蔡元培任校长和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之后的那几年里，对于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激励人心的地方。蔡元培是一个革命家，他把古典教育与他在法国和德国的长期研究结合起来，聚集了一批负有盛名和独立不羁的学者和知识界领袖做教授，这些人从保守派到激进派都有。陈独秀创办了名噪一时的《新青年》杂志（法文名称是La Jeunesse），这份评论性月刊成了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和文化、社会改革的论坛。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就发表在这种杂志上，它还讨论中国妇女的地位问题，婚姻问题，现代教育问题，并抨击孔学，提倡科学和民主，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讨论创造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必要性。大学的学生受到《新青年》和一些教授批判精神的激励。1919年1月，他们办了一种学生杂志，名

叫《新潮》。学校里有许多社团，如学生节约会，民谣搜集社，新闻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⑥

陈公博说，他在学生活动中并不积极，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他的少数几个亲密朋友大部分都是广东人，谭平山和他同住一个宿舍；谭平山的族侄谭植棠和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声白，都是他在回忆录中所提到的。二谭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中是陈公博的同事。当时在北大当教师的马叙伦在他的自传中提到，陈公博和谭平山在他上课时总是坐在一起。毛泽东在自传中说到陈公博是新闻学会的成员。谭平山参加了新潮社，但陈公博拒绝参加。据他说，他讨厌该社他所认识的一个人。⑦

在陈公博学生时代的那几年里，最激动人心的大事就是"五四运动"，即北京学生组织的反对战后将德国在山东的领土权利判定给日本的示威游行。这是一个在心理上和在历史上都对中国人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事件。示威游行开始于1919年5月4日，在北京持续了一个多月，卷入的学生有数千人，有几百人被捕。陈公博在他的硕士论文中有几页是叙述"五四"示威游行和其后的活动的。"回忆这一时期的活动是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的"，五年后他写道，"我处在这个巨大的浪潮中，自始至终目睹了这一激进的运动，目睹了群众不满的加深和反抗的顽强性。此情此景在壮丽和忧伤方面与1898—1899年冬季俄国大学生的总罢课多么相似！"⑧ 在他1943年所写的《我与共产党》一文中，他说到他随着"五四"运动队伍的行列前进，不是作为运动的参加者，而是作为广东几家报纸的通讯员。在学生们冲进两个被断定为亲日官员的住宅之前他就离开了游行队伍；他只是后来在图书馆学习时才听说了这次袭击。他说，"五四"运动对他没有多大影响。⑨

在他的硕士论文中，陈公博在“五四”运动的记载之后，列述了作为这次运动的结果而出现的一些组织，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从这些组织中产生的。他并未说自己在任何这类组织中表现积极，但显然他拥护新潮社。“现在的许多共产党员都来自那个团体”，陈说，“我们的思想方法和我们思考的结果已影响了共产党。”

3. 早期的经历

1920年夏，北大毕业后，陈公博和他的朋友谭平山返回广东。他们决定创办一份报纸，在华南传播“新文化”，尽管对于什么是“新文化”他们还不十分明确。这份报纸他们起名为《广东群报》，陈公博任总编辑，谭平山任新闻编辑，谭植棠任文学副刊编辑。他们只有三千元资金。报纸第一期出版的当日，来自邻省广西的广州军事当局即下令，所有报纸一律停刊。这是要阻止报纸公开支持正要夺取该市的广东将军陈炯明。陈炯明夺取广州（1920年10月）后，陈公博在北京的同班同学区声白前来见他，向他介绍了陈炯明手下的两个人陈雁声和陈秋霖。陈炯明将军提出要把这两个人放在《群报》编辑部，并每月支付给《群报》津贴三百元。陈公博接受这两个人做杂务，但声明拒绝领受津贴，除非这笔钱作为这两个人的薪金，并坚持报纸不能变成任何人的喉舌。陈公博与谭平山都在学校任教，只能以部分时间从事报纸工作。[10]

B、陈公博与中国共产党

1. 广州共产主义的起源

1920年，陈公博曾经就学的北大著名激进派教授陈独秀

转向共产主义。他移居上海，并与共产国际代表接触。1920年5月，他在上海秘密发起了一个共产主义团体。[11] 陈独秀对于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颇感兴趣。两个俄国代表扮作商人来到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接触，其后又与《群报》团体接触。陈公博说，他们同意俄国人的建议，由他们这个团体在广东建立共产党组织，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一起在广州宣传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同意这样做，是因为广东政局不稳，国民党没有组织，没有纲领，他们为中国的状况感到烦恼，同时，也受到列宁在俄国的胜利的鼓舞，并被陈独秀的兴趣所感动。[12]

他们在自己任教的学校里征集教师和学生时并未产生困难。因为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即使在国民党员中，也已成为时尚。但使产业工人感兴趣则比较困难。党提倡青年团到机器工会、海员工会中去，甚至征集小商。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来到广州，应陈炯明将军之聘，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让陈公博任宣教所所长，推进党的组织工作。[13]

1921年7月，陈公博带着他的新婚夫人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这次大会，有许多问题，包括会议的日期在内，是有争议的。因为陈公博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对这次大会所作的说明在下面还要讨论，我在这里就不叙述大会的事情了。陈公博参加了四次会议，而未参加嘉兴附近湖上一条船上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根据他1943年所写的回忆录，大会给了他一个坏的印象；他说，大约一年后他与党的关系的破裂，就是由于这种痛苦的印象。[14]

关于第二年陈公博在广东党内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存在着争论。我首先提出他自己在《我与共产党》这篇文章中所做的说明。[15] 陈独秀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后离开广

州前往上海。广东党最活跃的党员是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主宣传）和陈公博（掌握组织工作）。陈公博说，大部分工作都移交给了他。“说也奇怪，广州的共产党并没有接受过俄国人的一分钱，党组织既没有固定地址，党员也没有薪金。”《群报》中的这三个朋友就从他们的薪金中捐献，作为党的经费。除青年团员外，党本身只有二十个左右的党员，其中约有一半是工人。主要工作是在工会中进行宣传鼓动。1922年1月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时，共产党员曾在来广州的罢工工人中积极活动；他们为党增添了不少海员工人。

陈公博说，他对这种事实颇感苦恼：他负责广东党的工作，但又无法尊重共产党的哲学，他认为这种哲学不过是一般宣传而已。他得不到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哲学的适当的资料，他的许多问题陈独秀也无法回答。因此，他决心出国深造。他决定去美国，因为他掌握英语。他说，陈独秀还在广州时曾对此表示赞同。

2. 与孙中山合作的问题

陈独秀去上海后，“一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名叫斯里佛烈（斯内夫利特，即马林——译者）的”，与张继一起从上海来到广东。他曾因在爪哇宣传共产主义而被驱逐，现在作为第三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陈公博曾同“斯内夫利特”和张继在广州一家酒店谈过一次话，张继（国民党元老之一）提出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合并的问题。这不是国民党容共的问题。陈公博感到这个问题他们两人先前即已讨论过，而且已有成议。这次的翻译是张太雷，他后来成了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征求陈公博的意见，陈提出几条理由表示不同意。虽然“斯内夫利特”提倡这种合并，并打算到桂林与孙中山

商谈这一问题，但却把争论留给了张继。后者争辩说，国民党已经老朽了，需要从共产党中吸收新鲜血液；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列宁在俄国采取的新经济政策其实就是民生主义。陈公博说，“斯内夫利特”与张继到桂林去见孙中山，但在返回上海的路上再未和他见面。他听说他们此行并无什么结果。⑯

3．支持孙中山还是支持陈炯明

1922年春季，孙中山和陈炯明不和。孙要推进北伐以统一全国，而陈将军——按道理是孙的下级——反对并阻挠这项计划。孙企图先从广西打进湖南。这一行动未取得胜利，他于1922年4月返回广东与陈炯明交涉，并从韶关发动进攻进入江西。陈炯明于4月20日从广州撤退到他的基地惠州。就在这时，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来到广州，准备在5月的第一周举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视察党务。据陈公博回忆，陈独秀决定前往惠州会见他以前的保护人陈炯明将军，并邀陈公博一同前往。陈公博偕同被陈炯明安置在《群报》的他的广东朋友陈秋霖一起，作为旅伴。陈公博说，那天他同他的朋友在惠州游览风景，并未参加陈独秀与陈炯明之间的会议。在归途的船上，陈独秀告诉他，一切迹象表明陈炯明将举行军事进攻，广州将有动乱。⑰

陈独秀返回上海的前一天，曾与陈公博进行过一次私人谈话，后者详细叙述了这次谈话。陈独秀说，在广东迫在眼前的斗争中，共产党应当知道自己支持谁。按道理应当联孙，但按实力则应支持陈将军。陈公博不知道陈独秀是否只是向他试探，但他断言，他本人主张，毫无问题应当支持孙中山，孙是真正的中国人。陈独秀回答说，应当等等看。⑱陈公博的这一说明与他脱离共产党有关。

由于局势动荡，陈公博准备赴美留学。他缺钱，又得安排照顾他的母亲。汪精卫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去见财政厅长，但就在这时陈炯明"反叛"孙中山的事件在6月16日发生了。孙中山不得不逃到一艘军舰上，广州在炮击中动乱了好些天。最后孙中山前往上海。[19] 由于这次叛乱，陈公博的赴美经费问题遂搁置起来。

这时来自上海党的总部的消息极少，因此谭平山想到上海探听消息。陈公博召开了一次会议，推举谭平山为广东党的代表前往上海。陈公博因忙于准备出国留学，留在广州照料党务。这次叛乱过去之后，他记得在报上看到孙中山已指定许多代表筹备改组国民党，陈独秀就是其中的一个。[20] 陈公博还透露他如何帮助营救幽禁在陈炯明将军兵营中的廖仲恺。他重申他并不认识陈炯明，但他找到陈将军的一个心腹朋友，劝他将廖释放的。

4．党的总部试图处分陈公博

这时陈公博有一段使他离开共产党的不愉快的经历。他的赴美准备工作将近完成的时候，张太雷突然来到广州，带来了陈独秀的信和党总部的指示，要求陈公博立即赴上海，回答人们对他的指责（说他在帮助陈炯明）。陈公博断然否认他与陈将军有任何联系。他拒绝去上海，因为他正在等待赴美护照的签字，同时也不能因为此行而浪费他宝贵的旅费。张太雷于是问他何以不去苏联而去美国留学。他声称，他对陈独秀和他的老朋友谭平山感到愤恨，他们都在上海，都知道他的赴美计划，知道他与陈炯明并无牵连。他交给张太雷转交陈独秀的一封长信，问他是否记得不久前他们比较孙中山与陈炯明优点的那次谈话。信中附带捎话给谭平山，叫他回想他们之间的长期友谊和合作，并问谭，为何不把他

所十分了解的情况如实说出来。第二天陈公博在广东党的会议上报告了这段经历，并宣布他不再履行党的任务。党员们对上海的这种行动表示愤慨。谭植棠和刘尔嵩都大胆地说了话：与会者全体倡议广东党应当独立。后来谭植棠因支持陈公博而被撤销党籍（两年后又恢复党籍），刘尔嵩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其他的一些党员也受了处分。[21]

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这篇文章中，通篇有一个防守据点，即他不认识陈炯明，从未受他雇用，也未为他工作过。但有些作者的说法却相反。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的陈潭秋在1936年出版的回忆中说，陈炯明反孙叛乱后，陈公博曾帮助过陈炯明的反孙斗争，经反复警告，被驱逐出党。中共的另一个创建者张国焘在他的自传中说，在这次叛乱之前，陈独秀已在设法与国民党合作。陈炯明叛乱之后，上海的中共中央曾写信给谭平山及广东党的其他负责人，命令他们与陈炯明断绝一切关系，并宣布支持孙中山。但陈公博和谭植棠却继续在《群报》工作，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2年7月）之后，中央委员会又写信给广东的党，威胁陈公博与谭植棠，如果他们不改变态度，就开除他们；并威胁广东党的书记谭平山，如果他继续容忍别人的反抗态度，就要受到严厉处分。张国焘继续说，由于广东的同志并未完全依从，谭植棠被开除，陈公博受严厉警告并退党，谭平山受到严厉斥责，暂时免去了书记的职务。[22]

这些说明，都是当时不在广州的人很久以后写的。后来一些第二手的日本资料则把陈公博与陈炯明连在一起，说陈炯明当广东省长时，陈公博是他的秘书。陈炯明倒台后，陈公博赴美留学。[23]

在当时局势中有关陈炯明将军反对孙中山的某些事实值得回顾一下，因为这些事实被后来对孙中山的偶像崇拜弄得模糊不清。这位将军凭着自己的资格，和有过反对满清的革命家的经历，而且在1920年从桂系军事集团手中解放了广州，使孙中山回到这座城市成为可能。他还邀请陈独秀到广州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位共产党的领袖明过他的光。对于孙中山举行北伐统一全国的得意计划，陈孙之间有过意见不合。许多著名的国民党同志在这位将军反对孙的这种企图时都曾同意他的意见。按照李剑农的说法，“所有知识界”都敦促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而陈炯明的行动是根据人民要求和平的普遍愿望行事的。他提到蔡元培，说蔡就是要孙放弃他的计划的一个。最早的中国共产党资料《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简史》坦率地说，孙的北伐显然会失败，共产党不同情孙中山，尽管它并不公开支持陈炯明。并说其他一些团体也不赞成孙中山。“最有教养的和最民主的分子都站在陈炯明一边”。它提到胡适博士，他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由于孙明显的不称职，他的许多朋友和追随者都劝他彻底放弃政治生涯。”按照张国焘对陈炯明反叛一事的说法，西南联省自治的倡导者都支持陈炯明将军，而许多国民党领袖都离弃了孙中山。九十四名老国民党员，由李石曾、蔡元培、吴稚辉、王宠惠领衔，联名发出呼吁，要求孙中山引退。这对孙中山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大概这就是使他接受与小小的共产党合作的因素之一。[34]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陈公博支持过陈炯明将军，或者说，如果其中某些成员领取陈炯明报酬的《群报》曾支持过陈炯明，那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但这显然是促使陈公博脱离共产党的有争议之处，关于这件事，有限的证据都是极为

互相矛盾的。[25]

C、离开共产主义之后

1. 陈公博赴美就学于哥伦比亚大学

1922年11月初，陈公博乘船赴日本，途经上海时连停都未停。在日本廖仲恺要陈公博和他一起回广州，并请他当法专校长，但陈公博拒绝了。另一次，他在热海见到廖仲恺，廖问他对国共合作的想法，陈把他不久前同斯内夫利特和张继的谈话告诉了廖。于是廖建议他们同越飞谈谈此事，陈公博这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位俄国使者在热海。陈公博说，苏俄已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越飞很严肃地告诉陈，中国只能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肯定不能实现共产主义。在回答陈公博的问题时，越飞对苏俄即使在六十年内能否实现共产主义也表示怀疑！廖对陈的疑惑发笑，并说："我们要建设革命党就要建设现在的革命党，不是要建设一百年以后的革命党，我们应该努力实行三民主义，未来的事不必讨论了。"[26]

陈公博说，他于1923年2月12日乘船赴美，2月28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3月1日交费。[27]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注册员的登记，陈公博于1923年春季的那一学期约迟一个月进入大学院。那时他是三十岁，但他误填的生日（1891年8月28日）使他成了三十一岁。他在1923年春季、夏季和秋季所学的课程几乎都是经济学，并在第一年学习期间积累了三十多个学分。他完成了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并于1924年1月31日使论文得到弗拉基米尔·塞姆科维奇教授的承认，2月6日交出论文两本，2月22日取得硕士学位。他在1924年春季和秋季又学了

两学期，但未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到纽约后，陈公博从他的朋友谭植棠那里得知，共产党已在上海决定给他留党察看处分，因为他不服从叫他到上海和去苏联学习的命令。但那时他已因不满有反叛之意，不过他还是决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作一番彻底的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感到幻灭，但又不同意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英国的自由主义。他断定，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将能建设和复兴中国。因此他埋头研究美国的“实用经济学”，以造福于中国。他说他与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斯科特·尼尔林交往颇多。他在纽约的一所华侨学校教书维持生活。

他于1925年2月离开美国，未完成博士学位。他说这是因为他交不起印刷学位论文的费用。他开玩笑地称自己是“四分之一的博士”，因为他只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一半，而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又相当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或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一半！他将任教的广东大学给他寄了回广州的路费，于是他就取道欧洲回国了。[28]

2．陈的后期经历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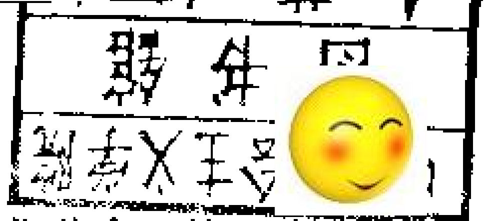
1925年春陈公博回到中国后，在政治方面、新闻事业方面和在政府里都很活跃，但这些活动没有一项和他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有关，所以我只概略地叙述一些主要事实。

陈公博作为廖仲恺的门徒参加了国民党，任广东省政府农工厅厅长，这一职务使他与共产党的创立者发生密切关系和冲突，特别是在有关省港大罢工的问题上是如此。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后，他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长，有一个时期他还代理中山大学校长和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他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

会，这标志着他政治上的重要性。这时他和汪精卫关系密切。北伐的第一阶段，他在蒋介石直接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中任总部政务局长。北伐军夺取汉口和汉阳后，他在新的湖北省政府任外事委员和财政委员会主席。在汉口，他积极鼓动反对英国。拿下江西后，他被任命为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省长。1927年3月，他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九人常委会，并任中央党部劳工部长。他是武汉政府事务中略带偏激的重要人物，曾经支持汪精卫是年六月所作的国民党与共产党联盟分裂的决定。

此后，陈公博的政治生涯便和汪精卫的命运紧密地联在一起。1927年夏秋，他参与对国民党宁汉两派的调解，但调解的结果汪精卫不满意，于是两人一同引退。陈支持汪在广州建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的努力，但共产党1927年12月11—14日的广州暴动使汪陈二人一时处于困境。国民党未让他参加1928年2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会，虽然他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作为一个广东人、左派和汪精卫的追随者，陈公博在国民党改组派中很活跃。改组派是反对蒋介石日益增长的权力的。1928年5月，他开始在上海出版《革命评论》周刊，这份刊物成了改组派的机关刊物，受到广泛阅读，1928年9月，被南京政府下令停刊。⑦ 据一位外国观察家说："学生，工人，失去领导的前共产党员，党的工作者，不再容忍混乱局面的政府官吏——所有这些阶层（在1928年）都转向陈公博先生，以他为领袖。"⑧ 1928年12月，他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历史上的革命》。⑨ 陈在1928年还在上海办了大陆大学，但到1929年5月即被政府下令关闭。1929年3月12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和其他十一个著名的国民党员



发表宣言，指责即将在3月15日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为非法。大会遂将陈公博"永远"开除出国民党，并警告汪精卫和他的左派集团的其他党员。陈公博和顾孟余是《民心周刊》的编辑，该刊物提倡继续发扬孙中山1924年改组国民党的精神，把党建立在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

汪精卫和陈公博参加过几次对南京政府的反叛，其中最重要的是1930年夏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所领导的反蒋斗争。这次反蒋运动由于北京的新政府遭到张学良部队从满洲的打击而告失败。汪和陈退回广州。1931年9月18日开始的日本侵略满洲给国民党各派带来了部分的和解。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使汪精卫和他的追随者，包括陈公博在内，恢复了委员资格，在1932年的政府改组中，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陈公博担任实业部长。

陈在南京政府担任部长近四年，1935年后半年有人企图刺杀汪精卫，这以后他辞职了，但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年他发表了在政府工作四年的记事：《四年从政录》，1936年至1937年间，他游历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和德国，中日战争爆发后回国。虽然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民训部部长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但并未给他什么重要的政府职务。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合作企业委员会主任。他在国民参政会中也可以说是一个代表国民党员的"国会领袖"，该参政会于1938年7月在汉口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当汪精卫在1938年12月离开自由中国与日本合作，迈出他致命的第一步时，陈公博在河内曾与他磋商。据说陈公博曾试图劝汪不要作日本人保护的政府的首脑，但最后他自己也跟着汪参加了这个政府，并当了立法院长。1940年10月，





他任上海市长。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死于日本后，陈做了南京政府主席。战争结束后他前往日本，但被送回中国受审，并被判处死刑，1946年6月3日被处死于苏州。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陈公博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完成于1924年1月，他后来参加的国民党就在这时在广州举行着第一次代表大会。



二、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

A、陈公博的一些想法

这篇论文阐述了1920年代早期一个多少受了点马列主义影响的中国青年民族主义者的思想。用经济解释历史，是陈公博的中心思想。绪言和第一章详细评论了中国经济的萧条状况，陈公博把这归因于帝国主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支配，中国无法解决它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人民转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萌芽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土壤。”

陈把1911—1912年的革命解释为基于经济原因；不堪忍受的外债负担要求推翻满清，作为从帝国主义束缚下取得民族解放的第一步。但这次革命是一种失败，因为经济状况并未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甚至更厉害了。共和国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保守派则企图恢复君主制，但这种企图失败了。陈告诉我们：“凡是保守主义失败的地方，激进主义就要取得胜利。帝国主义侵入的地方，共产主义就开始兴起。”

在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先驱”，陈公博作为战后幻灭时期北京的一个学生，以亲身经历来说明问题，这种幻灭是因胜利的盟国处理中国问题而引起的。他描述了“五四”运动时学生抗议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判归日本时所表现的激动和他们的行动，这种描述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爱国气氛。他讲述了激进主义的发展，以及“到民间

去"，准备革命的运动。然后他列举并简略地叙述了作为1919年运动的结果并从中产生共产党的六个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总工会，新潮社（他所拥护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女权运动同盟。陈指出了每个组织导向共产主义的倾向。这一章是直接产生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环境的较早的和有价值的再现。

B、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陈公博的论文包含着我所知道的第一次大会参加者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这次大会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这篇论文里有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从论文中，我们知道这次大会有十二个代表（他未提姓名），会议从1927年7月20日开始在上海举行，持续了两周。第一周的最后一天，警察使会议中断，然后又在一个著名湖中的船上复会。我们知道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不与其他政党妥协或合作的激进政策；提出它的目标是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结束资本和生产手段的私有制；并决定与第三国际相联合。它十分强调组织产业工会，建立工人学校，并建立一个培养革命领导人的研究机构。代表们热烈讨论了党员是否能在政府机构中任职或在议会团体中工作的问题，以及是否反对孙中山和推翻南方国民政府的问题。由于对国民党政策的意见不合，遂使党的第一个宣言压住未发，因而不为人所知。陈公博还提供了这次大会两个文件的译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如果这都是真的，那么它们就是这次大会唯一为人所知的文件。

让我们来检验一下这些材料的确实性。

1.大会的日期

现在中国共产党把7月1日作为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该党建立的日子来纪念。[①] 但对这次大会实际上何时举行来说，这是很不可靠的。有的说是5月，有的说是7月。陈公博写他的论文时，仅在他参加了的这次大会的两年半以后，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举行”。

其他参加者都留下了关于这次大会的说明。陈潭秋在1936年发表的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录说：“在1921年7月的下半月”，九位客人来到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他们来上海是为了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大会在“7月底”开幕。[②] 董必武在1937年夏季向尼姆·韦尔斯（斯诺夫人）回忆时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在1921年5月建立，那时陈独秀与李大钊为此来到上海。我未出席这次会议，但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③] 另一位参加者毛泽东在1936年夏季向埃德加·斯诺叙述了他的生平，但未确切说明这次大会本身的日期。他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的会议，在这个会议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斯诺这本书的下一节，毛说，“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一共是十二人。”[④] 这就是他所说的关于这次大会的一切。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未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按董必武所说，他们曾于5月在上海建党；因此毛可能在5月参加了建党会议，也参加了代表大会本身。

周佛海在1943年1月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记述。[⑤] 他叙述了1920年夏季的初步讨论，讲了他自己

⑬

作为一个学生在日本的一些工作，然后他说，上海的同志写信告诉他，他们计划在7月（指1921年7月）举行一次代表大会。因为是暑假，所以他能回上海参加。周说了另外九个代表的姓名。周佛海提出的其他情况将在下面讨论。最后，张国焘曾作过几次说明。1953年他写道："1921年5月我遇见毛，那时他被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次会议。大会上我们有十二个人。"⑥这说明了遇见毛的日期，但未必是大会的日期。在1954—1957年罗伯特·作顿帮助他写的自传中，张国焘说，已决定6月中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时间逼近，陈独秀还未从广州来到上海，但陈公博来了，带来陈独秀的一封信，解释说他无法离开。6月底该到会的代表都到了……决定代表大会在7月1日正式开幕。⑦

这样，在六个参加者中（我所找到的他们的记载，按写作的年代顺序编排），一个说是7月20日，另一个说是7月底，第三个含糊，第四个说是7月，第五个说计划在7月召开大会，最后一个说是7月1日，即公认的日期。

在历史著作中也有同样的混乱。大概是1926年底编写的一本内部著作《中国共产党简史》所提出的时间是1921年5月。⑧余昂礼（音）1929年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写道：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在上海举行。⑨陈绍禹在1936年写道："今年7—8月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十五周年纪念。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时，只有几十个党员。"他也提到"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⑩人们还可以收集更多的这类证据，来说明这一历史性会议的确切日期是拿不准的。

陈公博是报道建党日期最早的参加者，他所说的大会开

幕日期（7月20日）是最精确的。他想在《寒风集》的一篇文章《我与共产党》中证实自己的说法；关于第一次大会，这篇文章比他的论文提供了多得多的细节，不过这是在将近二十年之后写的。[11] 他说："在7月的头十天里"，他所任教的广州法专和师范学校都已开始放暑假，因此他和他的新婚夫人乘船赴上海，并在大东旅馆下榻。如果他关于暑假日程的叙述是准确的，如果张国焘所说的代表大会在陈公博到达并交了陈独秀的一封信之后才召开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第一次代表大会就不大可能是7月1日在上海开幕。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即，能够得到的关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间的证据都是互相矛盾的，不过陈公博所说的7月20日这个日期与官方日期应当同样值得信赖。

另一点与大会经历的时间有关。关于开了几次会与会议是否连续召开，说法也不一致。在会议参加者们的记忆中，突出的会议是：一次是在李汉俊家，这次会议被闯入的密探和随后的警察所破坏；最后一次会议是在浙江嘉兴附近湖中的一条船上。

陈公博在论文中说："这次大会持续了两星期，选了五个委员会起草纲领、计划和宣言。"[12] 在叙述了所讨论的一些问题之后，他说："大会第一周的最后一天，许多议案还在考虑和讨论中，警察突然出现了……侦探和警察包围了开会的楼房，但幸运的是十个代表警告别人有危险，并且逃走了……为了防止再出现这种中断，会议改在警察管辖达不到的一个著名的湖中的一条船上举行。"

为对比起见，这里把其他参加者所说的话按写作的年代顺序列举如下：陈潭秋说会议开了四天。但他把被破坏的那次会议说成是在第四天。会址被警察闯入后，每个代表都得

找一个过宿的住所，因为再返回他们住宿的女校已不安全。起初他们指望七天完成大会的工作，但经过这一事件，他们决定把时间缩减到五天。因在上海找不到开会的合适地点，遂决定到嘉兴附近的南湖开会。到达南湖后，他们租了一条大船，买了食物和酒，在船上完成了大会的工作。这是最后一次会议，李汉俊和陈公溥都未参加，因为搜查发生后有人监视他们。⑬

毛泽东和董必武对这件事都未提供资料。周佛海1942年写道：每晚在李汉俊家开会。会议进行到第四天，对秘密会议富有经验的马林警告，第二天必须把会议移到另一个地方去开，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开会已有几夜，警察肯定已注意他们，但他们认为另找一个地方实在太难，因此决定在同一个地方举行最后一次会议。第二天下午，周因病未能参加会议。这一夜约到午夜，他被偷偷返回他们住宿的博文女校的毛泽东叫醒。毛讲了可疑的闯入者和马林叫大家都逃走的事。然后周描述了警察搜李汉俊家及查问李汉俊和陈公博的细节。他说，他和毛讨论如何使第二天的会议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并声言，他想起与会者之一李达的夫人，她是嘉兴本地人。因此，在那个不平凡的夜里，他到了李先生和李夫人家，在那里一致商定由李夫人乘火车前往嘉兴，并在南湖为会议租一条船。正是由于他的主意，他们才能在嘉兴聚会，完成了大会的工作。周说，他们在黎明前通知了每一个人，第二天上午大家分成小组到了火车站。李夫人已租好了船，来到嘉兴车站迎接他们。在雨雾中他们在湖上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⑭

因此，按照周佛海的回忆，他们开了四天会，随后第五天的会议被中断，但他们能够在当天夜里为最后一次会议作

出计划，并在次日，即第六天，在另一个城市开完了大会。

按顺序，下一个是陈公博在《寒风集》中的记载。他谈到“短短的四、五天的会议”，并说，“一连四天我们都在李汉俊家开会”。他记得，他们“连日”在同一地点开会是缺乏警惕，据他说，这是他和会议主席张国焘有争议之点。陈未参加游艇上的最后一次会议，其原因将在下面说明。⑮

顺便说一句，周佛海说马林和维经斯基参加了会议，陈公博提到他们，是指那次夭折的会议。董必武也记得有两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他们的会议，一个是荷兰人，他们叫他马林，另一个是俄国人，名字他已忘了。⑯

张国焘特别不同意陈公博《寒风集》中的记载。他讲到有几天的讨论，但没有说明开过几次会。然而他指出7月1日是会议开始日期，而且说那次夭折的会议是在7月8日。他断言，这是在李汉俊家开的唯一的一次会议，又说，不论是马林还是维经斯基，都未参加过大会的任何一次会议。他说，马林是故意离开的，因为李达和李汉俊讨厌他，但他被邀请参加7月8日晚的那次会议，因为他要就党的章程讲话。在宣布开会之前，出现了一个可疑的人，在法国警察来到之前，除李汉俊和陈公博之外与会者都走开了。张说，第二天上午他接触了陈公博，因接触李汉俊不安全。李达的妻子建议他们在嘉兴南湖边上她家乡的村子里聚会，在那里她能弄到一条船。7月10日，所有的人都分别乘早车，到达嘉兴后上游艇，举行会议。除陈公博外其余的人都参加了会议。陈请求免除他参加会议。因为他的妻子还在为头天夜里的事件——即警察对她丈夫的查问——所引起的恐惧而痛苦。⑰

未参加这次大会的肖旭东有一段奇异的叙述。他声称，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朋友，他在这次大会开会时来到上海，前往法租界环龙路毛停留的地方。当时毛不在那里，但晚上回来告诉他因秘密警察而出现的麻烦，警察扣留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查问。代表们已散在各处，只间接地保持接触，而且必须停止活动几天。肖声称，有一天毛告诉他，他们有一个新计划，即装作去杭州的旅行者前往嘉兴。毛邀肖同往，会后去杭州游览。第二天上午他们乘车前往嘉兴。在他们离开火车站时，其他代表外表上都装作互不相识。他和毛在一家旅馆找到一个房间住下，于是毛就去开会。他晚间很晚才回来，肖同他讨论共产主义快到天亮。⑱

如果肖的亲身经历是确实的，这就说明，在遭到查抄的会议与在游艇上的最后一次会议之间，又过了几天。

从排列的这些回忆说明来看，这些人似乎开了五次会，但第四次被破坏了，工作是在湖上的第五次会议上完成的。前后经过的时间至少是五天，如果第四次和第五次会议之间不容丧失一天的话。有许多证据可以拿来反驳周佛海的回忆，即安排在游艇上开会并未丧失时间；正如张国焘所回忆的那样，在第四次和第五次会议之间大概至少间隔了一天的时间。但张国焘说前后经过的时间是十天，而陈公博在他的硕士论文中说，大会持续了两周。据他说，被闯入的会议是在第一周的最后一天，这就和张国焘所说的7月8日，即会议的第八天很接近。因为陈未参加最后一次会议，所以他可能不知道这次会议是在他被警察扣住查问的那次会议之后多久举行的。

我一直未找到一份报道警察查抄的当时的报纸，这种报纸报道会确定那次会议的日期。但却有一个有趣的线索。

在《寒风集》里，陈公博讲了警察查抄的事，随后对他回到大东旅馆后当天午夜发生的一个事件作了生动的说明。那天夜里热不可耐，他和他的妻子很难入睡。当时他被一阵猛烈的暴风雨所惊醒，他似乎听到了一声枪响和一阵呻吟。他跳起来打开门，但再未听到什么，因此他把他的“梦”告诉妻子之后就上床睡觉。大约九点钟，一个佣人冲进屋，告诉他们一个消息，隔壁房间有一个女人被杀。佣人说，头一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住进旅馆。这天早晨那个男人起来，叫了一碗鸡蛋面，随后就离开了旅馆。向他收费，他说他妻子还在屋里，他还要回来。后来这佣人进房打扫，发现一个女人死在床上。经理马上到来，发现她体内有一颗子弹，并有一条毛巾缠着她的脖子。显然那男人向她开了一枪，但未打死，因此要用毛巾勒死她。

陈公博说，他担心警察向他查问此案件，因而发现他是会议被查抄后的那个被盘问者。所以他和妻子即刻决定前往杭州旅行，在杭州他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案件的详细报道。这对男女因无法结婚，决定同死。好象是命运所使，那男人的一枪并未打死女的，因此便用毛巾勒死她。大概那男人突然改变了自杀的念头，写了一封自白的长信便离开了。[19]

这些细节可由1921年8月6日的《字林周报》的一篇记载来证实，从而确定被警察查抄的第四次会议的日期。这篇报道在“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的标题下，讲了一个有犯罪经历的青年男子，曾在“上星期五”（即7月29日）与一青年妇女到大东旅馆，并登记为商人。星期天（即7月31日）大约中午，他走出旅馆时旅馆要他付帐。他说他妻子还在房里，他还要回来。下午七时左右，一佣人到这对男女的房间，发现女的死在地板上。她的左臂和大腿被打伤，显然是

一颗子弹打的，并有一条毛巾缠住她的脖颈。地板上有一支三十二毫米口径的手枪，桌上有那个男子所写的五封信，说他和那女人打算同死。地板上有几粒打不响的子弹，可能表明那男人确曾想打死自己。还有一封给一家中国报纸的信，要求公布全部案情。[20]

陈公博在1943年追记的1921年这一案件的细节与《字林周报》所报道的事实是如此的吻合，以致共产党夭折的那次会议似乎就在7月30日（星期六）晚上。也有某种矛盾之处——陈的意思是，发现那个已死女人的事是在早上，而《字林周报》的报道则是晚上。

也许我们不应排除这种可能性，即陈公博在这一案件发生二十二年之后的回忆中玩弄花招，使他把第四次会议的警察抄查和他在他所停留的旅馆中听到和读到的杀人的事结合在一起。如果杀人的事不是在警察查抄的同一个夜晚发生，这至少提供了一个最后的日期：被破坏的会议大概发生在7月30日以内的几天。如果这一推论是正确的，这两个日期——陈在1924年所说的7月20日大会开始日期，和他1943年追忆的7月30日杀人事件的日期——就近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起止日期。

2. 关于大会资料的可靠性

陈公博所说的关于大会的工作、关于大会的争论和决议案，其可靠程度如何？假定他离开中国一年之后所写的论文是学术性的；鉴于他写论文的时间较早，是在官方的解释确定之前，是1927年国共分裂后在共产党内部以及在国共两党间激烈斗争发展之前；并考虑到他所处的独立地位（至少在心理上已离开共产党，但尚未加入国民党）——假定这些情况都是确实的，那么就有某些理由推断他的研究报告的客观

性。

陈公博提供了三类资料——纯粹的事实细节，所争论的问题，以及文件资料。这些都可以分别予以评价。

有些纯粹是事实的细节，能够易于以其他的独立的资料加以确证。可以确证的一个事例是这种说法：参加大会的有十二个代表，代表七个地区——广州、北京、上海、湖南、山东、天津、汉口，和在日本的中国同志。陈潭秋、董必武和张国焘都列了相同的十三个代表（用罗马字拼写时有变化），而张国焘解释说，其中一人何叔衡被毛泽东派回湖南，以一种托词使他离开会议，因此实际上是十二人。除未提到天津外，所有这三个名单在确定代表来自何处时都与陈公博的说法相同。显然陈在列举天津时是疏忽了。

另一个事实细节，即大会的日期和进行的时间，已经讨论过了。关于警察抄查和湖上最后一次会议的叙述，已被陈潭秋、张国焘、周佛海和肖旭东所证实，而《中国共产党简史》也提到警察抄查的事。虽然陈公博未参加最后一次会议，但有一句话的叙述，说明他清楚这件事，在事实细节上记得不错。

但他还是略去了某些他所知道的细节：代表姓名，他参加大会的事实，以及共产国际顾问至少是在幕后的出现。[21]

陈公博使我们感觉不到大会有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以《简史》和陈潭秋、张国焘的回忆来判断，显然是普遍存在的。张国焘特别认为李汉俊和陈公博本人是相当学究气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在争论中属于"持骑墙态度"的一方。[22]

关于复杂得多的问题，例如大会上有争论的问题，我们应当期待来自各种资料的不同报道。在报道中，每个参加者可能在争论的是非曲直上受自己观点的影响。而且官方"路

线”一旦确定，后来的报道者——如果他们是好党员的话——大概都会受这种路线的影响。

陈公博提到两个引起严重争论的问题。一个是党纲中的一条，禁止党员做政府官吏或议会议员，或者甚至中学和大学校长，即使是政府指派的，也不许做。反对者认为，教育工作不应列入官吏一类，而且党员应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甚至在政府职位上，积极活动。由于未能获得这些反对者的赞同，这条规定留待下次大会决定。在这点上陈的态度是中立的，他只作了简单的报道。董必武在十六年后回忆说："争论的问题之一是官吏和技术工作者能否成为党员。有的人反对。通过的决议是一种'关门'政策，使党员成为秘密的和'纯粹'的。"[23]

陈公博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大会的宣言中，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是否应和北方政府一样受到指责和抨击。少数人主张，国民党的纲领尽管有许多错误观点，但还是多少代表了一种新的倾向，而且，他的民生主义颇象国家社会主义。多数人则坚持，因为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所以南方政府应当推翻（陈未说他赞成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少数人的意见）。宣言最后通过了，但第二天又决定将宣言的公布问题留给中央执行委员会解决。宣言没有发表，因此"这个宣言遂不为世人所知"。[24] 董必武笼统地证实这一点，他说："我们决定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党的这第一个文件我们连一个抄本都没有。"[25] 陈潭秋证实，有关于孙中山的争论，但他把这次争论放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这次会议陈公博未参加）。他说，包惠僧（广东代表）反对孙中山，并提倡象对待北方军阀一样对待他。陈潭秋说，这种想法被其他代表所否决，他们采取下述方针："一般说，对孙中山

的主义必须采取批判态度，但对他的各种实际的和进步的行动，则应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予以支持。这一原则的通过奠定了国共两党进一步合作的基础……”[26] 这就证实了对孙中山的政策有争论，至于决议，则与陈公博的说法相矛盾。这种分歧之处可以由陈公博未参加最后一次会议这一事实来解释；但陈潭秋1936年的叙述也可以用下列事实来解释：与孙中山的合作后来已成为中共政策的要旨——简言之，他可能是回过头来把后来的官方政策说成是1921年的政策。

陈公博1943年的文章对此有详细的说明。他说，他强烈反对通过把孙中山和徐世昌这两个南北对立的总统相提并论和同等批判的宣言。宣言通过后，他找周佛海和李汉俊商量补救办法。终于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他指的一定是第三次会议），他提出了一个修正建议，即宣言的发表问题留待新选的书记决定。回到广州后，陈公博与新任书记陈独秀议论此事，后者决定宣言不发表。陈公博说，这就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没有宣言的原因。[27]

结论——陈公博1924年论文所提的两个重要争论与后来其他人的回忆是一致的。他关于争论的结果的报道看来至少象他后来的叙述一样可靠。即使我们从他后来所写的文章中知道，他曾强烈地卷入了斗争，但他的叙述似乎还是客观的，而且也抑制了自己的观点。

3. 文件的真伪

陈公博对于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决定的许多说明，都是直接引自他在附录一和附录二中所提供的那两个文件。按照论文的目录表，六个附录每个都是译自中文。

我一直未能找到这两个文件的中文本，也未找到它们的其他译文。它们是否可信？如果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其真伪

就只能靠占优势的证据去推断了。

六个文件中的两个（附件三和附件六）能得到中文本。[28]从这两个文件我们可以看出，在他写这篇论文时，他在纽约确实有一些可供利用的文件。他对这两个现有的文件的翻译大体上是忠实的，尽管他用的许多名词与现在共产党的习惯专门用语不一致。

我们知道，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实是有文件的。《简史》说，陈独秀曾把他写的一份党纲草案送去在会上讨论。陈潭秋提到，就在警察袭扰在李汉俊家举行的会议之前，“我们迅速收拾起文件，消失了。”他还提到最后批准党的章程的事。张国焘描述了游艇上最后一次会议通过的决定之后说，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将接受大会的各项决议，并使这些决议成为党的文件。周佛海说，在游艇会议上通过了党章和组织工作章程。董必武说，“这第一次大会的所有历史资料都丧失了”。[29]

考虑到实际上并未开成的第四次会议遭到破坏，游艇上的第五次会议又要迅速开完，看来决定或决议案的最后文本大概必须由会后的委员会产生。陈公博大概无论如何没有从上海随身带走任何文件。这是从他自己后来的回忆录中推断出来的。他说李汉俊家第四次会议遭到查抄时，其他的人都逃走了，但他和李仍在那里。三个法国警官和四个中国便衣密探彻底搜查了房间，他们看了一片纸上潦草地写着共产党的组织大纲，但未看出它的重要意义。警官的确注意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和文章，但显然对李汉俊的解释表示满意：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所以各种书都要读。最后两人都被查问。警官走后，陈公博动身回他所住的旅馆，但发现有人盯梢，他在“大世界”娱乐场电影院甩脱盯梢者，匆

忙返回旅馆，锁起房门销毁了文件。他没有参加湖上的最后一次会议。[30]

如果这次大会产生了代表决议案的文件，那么陈公博很可能会有这些文件。在其后的一年里，他是广州党的领导人之一，负责组织工作。在他1922年11月离华赴美时，虽然已被疏远，但他还是一个党员。他是否随身带了几份文件，或者很可能是在他决定了硕士论文题目后写信回广州要材料，这我们只能推测。

有趣的是，附录一和附录二的标题并未把这两个文件说成是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叫"第一个纲领"，另一个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对比之下，附录三的标题则是"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附录四的标题是"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然而陈公博却是把这头两个文件作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引用的，而且他的叙述也是建立在这两个文件的基础之上的。

陈公博引自这些文件的几个具体问题被其他参加者或早期的资料所肯定，但有一点是有争议的。陈潭秋支持陈公博的这种说法，即大会的重要决定之一是要采取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党的主要目标是组织产业工会。他说，"最后总路线被接受了，在这条总路线中，承认党的主要任务是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提出把发展工会运动作为党的工作的中心任务"。[31]

有争议的一点是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否决定中国党参加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陈公博说，代表们是这样决定的。除利用他的记忆外，陈公博还有附录一，即第一个纲领，该纲领说："2.本党纲领如下：……D、联合第三国际。"附

录二（关于中国共产党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说：

"（6）本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

党的中央机关每月应向第三国际作一报告。必要时应派一正式代表至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所在地之伊尔库茨克，此外并应派遣代表至远东各国，推进在阶级斗争中联合的计划。"

关于这种决定，陈潭秋的说法与陈公博有矛盾。他说，一大期间党与第三国际之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②]《简史》在叙述了陈独秀党纲草案的温和性以及李汉俊对俄国共产党的反对态度之后说："很明显，由于代表大会上的这种机会主义思潮，不要说讨论，就连提出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都不可能。"[③]

这两个资料，一个写于1936年，一个写于1926年，确实都是与陈公博的说法相矛盾的。哪种说法对呢？

从亨尼亚·米可夫·尤丁和罗伯特·C·诺斯合编的那本值得称道的文件评述的书《苏俄与东方，1917—1927年》中，我们得悉，1920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有一个特设局设立在伊尔库茨克，从1921年2月开始发表每周简报，大概自1921年5月起，改为用俄文和英文出版的正规杂志。该杂志的主编是B·Z·舒米亚茨基。1920年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曾派遣两个代表去中国，一个是格里高里·维经斯基，可能就是后来参加中共一大的那个人。1921年春，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曾经在头年9月在上海参加过讨论建立共产党问题的张太雷，来到伊尔库茨克，与远东书记处建立密切联系，该书记处指示他写一个报告交给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

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另一个中共党员杨和德（音）也来到伊尔库茨克，两人遂与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开会讨论，讨论的结果，建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34]

提供这个情况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在伊尔库茨克的舒米亚茨基。这一情况是1928年他写的一篇纪念张太雷的文章中提出的，张在1927年12月广州公社时牺牲。据舒米亚茨基说，1921年春张太雷在中国支部的一次会议上列出该支部的任务如下：

> 1）建立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设在伊尔库茨克），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有关问题，向中国共产党和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提供情报，以及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
>
> 2）由两位书记负责本支部的事务：一个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派担任此项工作，一个由远东书记处委派。
>
> 3）本支部遵循共产国际组织方式，根据此种方式，各个国家的共产党均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同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远东书记处的关系也必须建立在同样的组织联系原则的基础之上，即，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成员由在远东书记处的中共中央的当地代表构成，支部本身下属于此书记处。[35]

张和杨于1921年6月离开伊尔库茨克，去莫斯科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我不知道舒米亚茨基引证张太雷所写的这些内容根据的是什么文件。他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央委员会，乃至

谈到中国共产党本身时，可能是弄错了时间，因为那时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尚未举行，尽管中国已有一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和小组，维经斯基也已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然而1921年春在伊尔库茨克的张太雷可能已料到将建立一个中央委员会。

无论如何，陈公博所提供的文件（其中谈到中央机关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的事，谈到向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正式代表的可能性），看来与1921年年中所发生的那些事非常吻合，比后来否认与共产国际有任何联系的那些作者的说法吻合得多。

4．最早的两个文件

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第一次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而附录一和附录二就是，我认为也是，体现第一次大会决定的文件。

关于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是一个组织章程，谈到党的名称，目的，党员资格的规定和党的组织机构。其组织形式非常简单。一年以后关于党组织的规定，如附录五所表示，要详细得多。

党的目标（这里叫做“纲领”）是：以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并消灭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至废除阶级；推翻资本私有制，实行社会公有制。对党员资格的规定是初步的：凡接受党的纲领和政策，保证忠于党，断绝与其他政党的关系，并有党员一人介绍，在为期两个月的审查后经党员多数表决同意者，即可成为党员。

党的组织系统把地方“苏维埃”（大概最好是译为“支

部”）放在中心地位。这种组织系统虽显然是衍生于别处的共产党组织，但在这里还是十分简单的。一个地方“苏维埃”如不满十人，只设一个书记；超过十人者应设一个财务员，一个组织员和一个宣传员；超过三十人者，应设一执行委员会，其章程以后另定。对于地方一级、中间一级和全国一级的组织上的等级制度，未作叙述，但预计党员超过五百人时，即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此以前，应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禁止党员担任政府官吏和国会议员。

虽然第六条规定党员要保守秘密，但我们还看不出象后来那样，是一个集中的有严格纪律的党。这种质朴是与中国党发展的这种初级阶段相适应的。

在陈公博的译文中没有第十一条，究竟是遗漏了一条，还是从第十一条起写错了条数，这无法说。第十四条括弧内的注，看来显然是陈公博自己加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N·哈泽德教授是苏联法律和共产党政府制度问题的专家，承他盛情检验了三个附录，并对这几个附录作了评论。对于这个第一个纲领，他说：“俄国同时期的党纲是1919年3月18—23日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这个俄国党纲的通过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因此可以拿来做比较的党纲或许是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那个党纲。

“中国的这个党纲确实是一种纲领和组织章程的结合。中国的党纲非常简短，与1903年俄国党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长篇回顾无法相比。

“其组织形式非常简单，没有组织上的等级制度，地方‘苏维埃’是规章的主题，‘苏维埃’这个俄国名词从未对

地方一级组织使用过，我在这里看到它感到惊奇。俄国人把地方一级组织叫做‘支部’（yacheika）。1903年俄国党有一个苏维埃，但那是唯一的最高执行代表会议，是在共产党组织的最上层。

“俄国党1903年的章程是复杂的，而且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起草者老练深奥。中国党的章程无法与之相比。”

如果将陈公博所提供的附录一与苏联共产党1919年3月18—23日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简单的中国党纲与俄国党对理论与计划的详细阐述之间并没有联系。[38]

关于附录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看来是一个重要文件，因为它提出了一个行动纲领。它对中国领袖们所考虑的重要问题和如何计划着手进行投下了一瞥。这个文件有六个题目：他们计划组织产业工会；通过出版杂志和小册子进行宣传；建立培训工人的学校；为培养党的工作者和进行研究工作而建立一个研究机构。文件对这些事业的每一项都确立了总的原则，这些事业讲得虽然有点笼统，但很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在其余两个题目中，决议案宣布了一种政治上的独立立场：“……本党应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准与其他党派或团体发生关系。”决议案也计划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并期望派代表到远东其他各国筹划“在阶级斗争中的联合”。

大概写于1926年下半年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证实，在党的第一年这些计划的前四项确实贯彻了。中国共产党曾经为组织产业工会而辛勤工作，特别是在上海、北京和天津。

党建立了出版社，出版所翻译的共产党经典著作。尽管这种事业并不很成功，但还是出版了各种杂志。《简史》叙述了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为铁路工人办的夜校，这种夜校对于赢得对工人的领导权是有助益的。已在上海建立的“外语学校”是共产党进行宣传和系统培训党员的中心。[37]至于与其他党派，尤其是与孙中山的国民党的关系，以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

哈泽德教授在评论这一文件时说：“我不知道在俄国共产党内有类似的东西，尽管这份文件的大体内容遵从了俄国人对工会和刊物的做法。关于与其他政党的关系，可能在革命后有过某种这类指示，但我未曾看到过这种指示。”

这份文件有一句括弧内的话，可能是陈公博加的。

C、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关于这次大会在何时何地召开，以及有谁参加的问题，有些不能肯定的地方。参加者提供细节的回忆录，即使有，也不多。目前中国共产党官方的说法似乎是，大会于1922年7月在上海举行，参加的代表十二人，代表一百二十三个党员。[38]《简史》指出会议日期是1922年6月和7月，并说有二十多个代表出席，但未说在何处举行。它提到，1922年7月12日“第二次代表大会快闭幕时”，陈炯明在广州发动了政变，并把孙中山驱逐出广州。《简史》在说到陈的政变时日期有错误，那是6月16日。[39]米夫在1937年写道，大会在7月召开，有二十个代表参加。华岗在1940年出版的两卷本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中说，大会于7月在杭州召开，出席代表二十人，代表大约一百名党员。布兰特、许华茨和费正清编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说，大会在1922年5至7月

在广州召开，显然他们是根据日本的资料。[39]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大会大约在1922年7月10日在上海召开，参加的正式代表九人，并有几个观察员，这些观察员他只指出两个人的姓名。在听取了一系列的报告之后，休会大约一周，等待一项宣言的起草，然后复会批准宣言，并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40]

陈公博未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在广州积极从事报纸工作，但仍在共产主义运动之内，而且在此后的几个月内依然如此。他的叙述，连同他所提供的三个文件，是我所见到的对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广泛详尽的说明。

陈公博说，大会在上海召开，有十八个以上的省派了代表。附录五（党的章程）的最后一条说："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23日）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这一日期是中文文件原有的，还是陈公博加的，我们无法确定，因为在其他附录中也有放在括弧内的注解，几乎可以肯定是他加的。[42] 然而我们在这里到底还是有了一个大会的十分明确的日期。

陈公博这样开始他的叙述：经过一年的斗争、经验和活动，党已从幼年进入成年，党员在推理方面不再是那样随便，而是更有肯定性。他们的行动计划更少分散性和更有系统性。这次代表大会发表了一个强有力的宣言，并根据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形势的观察，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纲领，这个纲领远比运动处于幼年时期的第一次大会所提出的方案有分析有综合。这种说法与《简史》的语调和内容惊人地相似。《简史》说，党的地位比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强得多了，党员的质量有了改进，党也更加有经验了。并说，聚集在二大的代表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纲领和目标的基础上团结一致，

都能进行辩证推理。《简史》说，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又通过一个阐明党对国内国际问题观点的宣言。

陈公博所说的党在第一年的成熟看来是正确的。在一大产生的两个文件和他所提供的二大通过的三个文件之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二大通过的宣言具有富于战斗性的反帝精神。决议案也比一大的详细得多，明确得多，表明对欧洲劳工运动的经验有一定的认识，反复宣称要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强调要有一个集中的有纪律的群众性的革命党。组织章程也比一大质朴的章程详尽得多，精细得多；它强调要有集中控制和纪律。

陈公博探讨了二大的几个重要决定，他的叙述主要是根据附录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这次大会丢弃了不妥协的政策，以便与国民党合作；承认蒙古、西藏和新疆的自治；并"采取议会步骤"（陈指的是鼓励党员谋求国会或其他议会的席位）。随后他说明了几个问题。

他以这种论点解释了"参加"与国民党联合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无产阶级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实现其摧毁封建主义的现阶段革命。国民革命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利。共产党应联合一切革命政党推翻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压迫，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的国家。他们应当领导工人农民，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作为走向建立他们的权利的第一步。

在这一章的末尾，陈公博谈到1921年底在莫斯科召开的革命党人国际会议，并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无疑就是由于这次会议"。他所提到的这次会议是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在1921年11月在伊尔库茨克举行预

备会议；其后代表们前往莫斯科，随后又到彼得格勒。大会从1922年1月21日开到2月2日。这次大会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而且是把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战略强加给国共两党的场合之一。[⑧]

因此在第十次会议上，代表们听取了著名的东方问题专家萨法洛夫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清楚地预示了对国民党的政策，这正是中共二大六个月之后要宣布的政策。萨法洛夫在谈到国民党时说：

> ……我确信，为了在一方面是共产党另一方面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达成谅解，双方很好地互相了解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南方政府中居于首位的这个党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党……我们希望将来与这个党并肩战斗……我们说：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地必须是民族民主运动。我们支持这种运动，只要它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就给予支持……而且将来也是这样。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认为这种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
> * * *
>
> 总之，我们可以说，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如象中国和朝鲜，实际上是外国资本的殖民地，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不能不支持民族民主运动。在这些国家，共产党必须提倡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并支持民主要求，如土地国有化，自治等等。但同时，共产党一定不能放弃他们的共产主义纲领，正如他

们不能放弃把工人阶级组织到不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会中一样。他们也一定不能放弃把工人阶级组织成独立的共产党……[44]

张国焘是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个代表，曾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过一个详细的报告。他回忆说："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就是在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精神和内容的基础上起草的。[45]

这些资料支持了陈公博的论断，即一大和二大之间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是由于革命党人的国际会议。

陈公博列举了共产党为与国民党合作所提出的"要求"。这就是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的有名的七点要求，其中最后一点又有六个方面。[46] 陈公博所说的有趣的一点，是承认蒙古、西藏和新疆作为自治邦，然后再和中国本部自由联合为一个共和国的问题。当时蒙古的地位是造成中国和苏俄间不和的决定性的争端。中国政府经常要求对蒙古的主权，反对蒙古自治，认为这是俄国的侵略策略。1921年2月，中国军队已被一支白俄军队赶出库伦。7月初蒙古人民军队和俄国红军进入库伦，7月12日建立了蒙古临时人民革命政府。11月5日，蒙古人民政府的代表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建立友好关系的协定。这种再度宣布俄国对蒙古的权利，是1921－1922年间苏联政府企图与中国政府建立正式关系的一个障碍。[47] 中共的蒙古、西藏、新疆自治邦与中华民国自由联合的方案，似乎是为使中国的民族主义避免一个敏感的问题而计划的一种策略。

陈公博以简略的叙述促使人们注意共产党人应在议会团

体中谋求席位的问题，这是与第一次代表大会相反的态度。然后他接着介绍了关于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决议。大会决定党应当在这些方面加倍进行活动。因为他的说法是复述了决议案本身即附录四所说过的东西，所以陈公博的意见我就不再重复了。但有两件事值得注意。1922年2月，紧接着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曾在莫斯科召开过一次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和远东各国劳动妇女代表大会。[38] 其次，1922年5月初，在中共二大之前的两个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都是在共产党指导下召开的。这些大会召开时陈公博在广州，对于这些大会他大概是消息灵通的。他举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确切日期是1922年5月2日至6日，提到有一百六十名代表出席，并列举了所通过的八项提案。[40]

最后，虽然陈公博未参加中共二大，但他对大会的主要决议作了清晰的说明，对政策的变化作了适当的解释。

1.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

陈公博列举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三个文件，其中的两个在我所见到的其他任何资料中都没有出现过。

关于附录三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是一个中文的著名文件。我将它与中共中央1926年10月再版的文本和1930年印行的译本对照过。陈公博所提供的是一个逐字逐句的忠实译文。[41]

但是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即这个文件的日期。如上所述，陈公博对这个文件所加的标题是"1922年7月第二次代

表大会通过”。这个日期是他的译文题目原有的呢，还是他补加的，都很难说。某些日文资料注明的日期也是7月。

但在中共中央1926年10月10日所发行的官方的中国共产党文件集中，这个文件在末尾用中文注明日期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2年5月”。这一资料紧接着印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第一个宣言》之后，该文件的日期是1922年6月15日。[52] 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朱其华含蓄地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注明为5月，然后他说，“这一宣言之后大约一个月，党又发出了关于时局的第一个宣言，”其日期他标明为1922年6月15日。[53] 这个“第一个宣言”的日期确实标明的是6月15日；中共中央1922年6月17日印行的原版文本现存国会图书馆。[53]

有争议的问题是，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的日期应当是5月还是7月，是在1922年6月15日“第一个宣言”之前还是之后。

夏连荫女士和我所注明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的日期是1922年5月，《关于时局的第一个宣言》是6月15日。这是根据文件的顺序和1926年中共中央的官方文件集所标明的日期，也根据两个文件之间对阶级阵线所采取的态度的不同，以及只有6月15日的第一个宣言才指名选择国民党为可能的革命同盟者这一事实。[54] 而另一方面，张国焘在三十多年之后回忆时说，他曾经为起草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而工作，该宣言是由经过若干重要修正的“第一个宣言”所构成的。

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本身有几处关于它的日期的线索。一处是它提到热那亚会议。[55] 这次会议从1922年4月10日开到5月19日。另一处提到吴佩孚及其直系与张作霖及其奉系之间的内战，在这次内战中吴佩孚取得了胜利，并控制了北

京。北京的控制权转到吴佩孚的手中大约是5月4日或5日，但战事仍在北京东北部继续进行，直到6月中。宣言把这次战争作为新近发生的问题加以论述："吴佩孚取得胜利之后，北京政府逐渐转入亲美派官僚之手……"[55]第三处线索是这种叙述："英国肆无忌惮地帮助反动将军陈炯明推翻孙中山在广州的国民党政权"，以及后面的这种叙述："尽管广州政府现在是被推翻了"。[57]看来这显然是说6月15日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政变。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手头的这种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其日期一定是6月中以后。事实上陈炯明的政变的结局大概有几个星期是不分明的，因为孙中山在广州附近的一艘军舰上避难，他的军队为控制广州继续战斗直到8月初。而且把陈炯明称为"反动将军"，似乎表明共产党的领袖们已采取了反对他的立场——这种立场显然是直到7月或者甚至8月孙中山到达上海时才采取的。[58]

根据文件的这种内部的固有证据，我相信陈公博作为他论文的附录三而翻译的宣言的文本，其日期的确是在7月的晚些时候。但也常常有这种可能性：为使文本符合现代提法，而在付印的译文中插入几句话，因而引起在文本内弄错年代日期。文件内固有的关于日期的证据不一定就是确证。

关于附录四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是一个重要文件，具有明显的可靠性。写这个文件的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列宁主义，以及对于党的原则和党的组织的理解，都比一年前起草党的决议的那些人清晰得多。这个文件代表着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此值得仔细阅读。

文件分九个部分，即有关九个广泛题目的“决议”。每个决议有一段关于现状的明确的说明。其语调具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风格，自信是完全掌握了“客观形势”。然后就是对党的行动的一系列明确的指导。

第一项决议是关于世界现状的，把俄国描绘成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并宣告中国共产党决定号召全中国被压迫群众协助卫护苏维埃俄国。

第二项决议是关于国际帝国主义的。说它对中国是掠夺成性的，是中国困难局势的根源。只有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中国才能统一。应当把工人们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为这一目标而战斗。

第三项决议是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这项决议对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以及从封建主义经过民主主义到达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的概念，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以此为论点阐述了无产阶级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帮助国民革命的道理。这项决议包括对党的一项重要指示，即要保持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决议中有一项有趣的声明，即“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的加入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这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一个关键性的决议，虽然尔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本身更具有决定性。

第四项决议简要地宣布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决定。大会接受了成为共产国际成员的二十一项条件。这些条件是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确立的，要求有一个牢固的共谋的组织。

第五项决议说明党员参加议会同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是正当的。按照陈公博的说法，这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相反。

第六项决议是关于劳工运动与共产党的，是文件的极为重要的部分，值得细读。这项决议根据"中国劳动运动的现状，和我们过去活动的经验，以及证以近代欧洲运动的教训……"确定了十九项基本政策。这些政策是老练的，不妥协的；是引导人们走向革命，而不是搞社会改良的。

第七项决议是谈青年运动的，很象是一个独立文件。这项决议简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青年劳工的地位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青年运动；讨论了中国青年劳工的地位；然后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之间的关系。中共承认社会主义青年团为"独立的团体"，但又说，"关于普通政治运动方面，社会主义青年则应当约束在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协定之下。"为了保证合作，"大会认为两团体在各级组织中有互派代表的必要；至于此项任务如何实现，应由两团体中央执行委员会按实际情况协商决定。"

这是否暗示，在这两个激进组织的领导集团之间有一种冲突？

关于妇女运动的第八项决议写得很象关于青年运动的那一部分。显然党尚未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妇女。但为遵从共产国际所指示的：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应组织一个委员会以领导妇女，选出一个妇女部，并在党报上开辟妇女专栏，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尽速采取这项计划"。

最后是关于党的组织章程的决议。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领导者的战斗的党的思想观念。"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党必须是集中的，有铁的纪律，党员要训练到行动上几乎与军队遵守纪律无异，并愿为党作自我牺牲。

我们在这些决议中不是听到了列宁的回声吗？

这个文件有两处关于大会日期的线索。一处是提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66] 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5月，可能是从1922年5月1日开始。[67] 第二处是这样说的：吴佩孚"谋求以武力统一南北，现在又恢复旧国会以证明他的诚意……"[68] 看来这是说1922年5月28日（吴佩孚赞同恢复旧国会）与8月1日（按1917年的国会法定人数开始举行会议）这两个时间之间所发生的事件。

关于附录五

《中国共产党组织章程》是除陈公博附录一的那个一年前原始文本的译文之外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这二者之间有一种联系。在附录一中，有关组织的规定从第四和第五条开始，说的是党员资格，这与附录五第一章关于党员的规定相一致。附录一的最后一条，关于修改党章的方法，与附录五的倒数第二条即第二十八条相一致。还有其他若干相似的地方。

但在隔开这两个文件的这一年里，如象我们所预期的，共产党显然发展了一套成熟得多的组织制度。有一章包括七条（四——十条）规定，是专门谈组织的。除了党员所隶属的基层组织（正当的叫法是"支部"）外，现在有三级组织：地方的，区的和中央的即全国的。在这种等级制度中，权力自中央通过区一级达到地方一级。通过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规定办法，协调地方一级和区一级组织。中央委员会的产生（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以及各级委员会的任期和职责，都有说明。

第三章（十一——十六条）是关于会议的，详述了各级代表会议正常的会议次数，并规定有权召开会议的人员。执行

委员会控制各级组织。关于纪律问题的第四章（十七——二十五条）对于如何向下行使权力，作了明确说明。在每年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的时间里，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最高权力；它能够指挥和解散各下属组织。地方的和区的执行委员会不得确定自己的政策，也不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政策之前对全国性问题发表意见。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一切党员均应服从。所有政策的决定，少数均得绝对服从多数。但一个组织中的多数即可向上一级对其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或行动提出抗议；并规定了解决此种争议的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开除党员的理由和程序。有简短的一章是关于党的经费收入的，其来源是：党费，党内的特别经费和党外的捐献。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党的经费收支。

最后一条（第二十九条）说，这一章程由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会议注明的确切日期是"（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并说这一章程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生效。

这一章程是以什么为范本的？根据一项资料，它的范本大概是1919年3月18—23日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Ustav）。[⑳] 此章程1922年3月27日至4月2日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作过某些详细修改，以后又在1922年8月党的第十二次会议（原文如此）上作过修改；但这已是在这个文件写成之后。苏联共产党的党章以后还有其他的定期修改。

尽管广泛搜求，我一直未能找到一本用我能读的语言印行的日期为1922年7月以前的俄国党的党章。因此我必须把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的求本溯源工作留给其他人去做。[㉑]

哈泽德教授读了附录五之后发表的意见如下："第八次

会议（原文如此）（1919年12月）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当时的章程一本也不存在。

“但写进党章的概念是相同的。因此：共产党支部的结构、组织上的等级制度、党的纪律和经费收入都和俄国共产党的党章一样。但这些都不是用同样的言词表达的，也不是在所有细节上都一样。

“给人的印象是，熟悉俄国共产党章程的某个起草者给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套章程，而把我所不了解的中国党的特殊情况（或许是历史上的情况）考虑在内了。”

关于这个章程，有一点或许具有特别有趣的历史意义：

“第二十二条。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

附录一中与此相当的一条（第四条）规定：“……但在加入本党之前必须与反对本党纲领的任何政党或团体断绝关系。”

这样，到1922年7月，中央委员会已有权同意党员加入其他党派或团体，允许党员保持他在其他党派的党员身份。其意义在于：此后不多久，到8月份，中国共产党人即开始加入国民党。1922年8月，中央委员会在杭州举行了专门的全体会议，正式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采取这一决定，据说是因为孙中山被陈炯明逐出广州后于8月14日到达上海，拒绝共产党提出的他的党和他们联合的建议，但同意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60]

附录五的第二十二条似乎表明，甚至在孙中山放弃在广州的战斗并返抵上海之前，共产党领导本身即已准备让它的党员渗入其他政党。有这一条规定的另一种解释也可以是：

在采取了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之后，这条规定按照陈公博所得到的这种样式作了修改。

D、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盟

共产党着手加入国民党之后，两党的密切关系即开始发展。但这种关系是逐渐演进的；其性质随着两党变化着的政治命运和它们互相利用的成功而变化。

陈公博对于这种发展着的关系的最早阶段，有一些有趣的看法。然而他个人大概并未卷入，因为根据以上所述的关于他的略传，1922年夏季他已开始脱离共产党事务，并于11月初前往日本。他对于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事态发展的叙述看来是含糊的。

他的论文的第五章大部分是根据孙中山的《中国之国际开发》和“三民主义”来解释孙的思想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并不把孙中山看作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但他又认为孙的纲领的基本思想是导向国家社会主义目标的。他解释了共产党对孙中山思想的态度，以及共产党要加入孙的国民党的原因。他们把孙看作是一位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加入孙的国民党是从民族主义观点而不是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的。陈公博引证二大决议案即附录四的第三条，支持此种论断，这一条说，中国共产党决定以一种暂时的联合加入国民革命运动，以便与封建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但不是投降国民党，国民党只代表资产阶级。

他谈到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一次会议，制定出合作的计划，[55] 但他显然不知道这次会议是否举行。他说，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在1922年7月曾发表一项

声明，要求所有党员加入国民党。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声明，而且如果在8月的杭州中央全会之前发出过大意如此的声明，我将感到诧异。

陈公博还说，共产党同时还发表过一个说明与国民党合作的理由和必要性的宣言，并说共产党的杂志《前锋》已开始宣传民族主义。他指的大概是“二大”通过的宣言即附录三，这项宣言确实主张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需要支援国民革命运动。《向导》周刊创立于1922年9月，是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它的重要论题之一，就是所有革命团体结成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陈可能把《前锋》当作《向导》作为他的译文了。

在第五章的最后，陈公博否认孙中山是社会主义者，否认他想把中国变成“赤色的”。西方报纸以此进行公开宣传显然激怒了陈公博；他坚持说，“民族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二者不可能混淆。”共产党所以与国民党合作，是因为民族主义能改善无产阶级的状况。他说，没有人能够预料他们合作的结果如何。

在第六章，他继续说明这个论题，并问，国共合作能持续多久，走多远。他指出，国共两党本来就各不相同，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一个承认资本的私有权，一个否认；一个接受国际资本主义，一个反抗国际资本主义；共产党承认蒙古、西藏和新疆的独立，而国民党拒绝承认。共产党提倡国际革命，而国民党的革命只是民族的。

对于1924年初在纽约写论文的陈公博来说，很明显，国共两党的联合可能就是暂时的。他引证了中共“三大”宣言（附录六）对国民党的批评。他引证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

以图建立无产阶级权力的战略，以及他们所计划的在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和基督教所组织的工会中活动时推翻原来领导的策略。[66] 他说，“两党的最后分裂对共产党人来说是十分清楚的。”[67] 他并预言，国民党在取得胜利时将与共产党破裂。

陈公博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3年7月在孙中山政府所在地的广州召开。《简史》注明这次大会的日期是6月，而且这次大会的宣言在一期《向导》周刊上发表的日期是1923年6月20日。[68] 看来大会召开时在美国而且已不再参加运动的陈公博是弄错了时间，只有当时的证据才是确证。

象开头一样，陈公博以对帝国主义这个中国苦难的根源进行抨击而结束了他的论文。他批判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2—1923年的华盛顿会议，认为第一个会议是“屠宰”中国，第二个会议未能恢复中国丧失的权益。他大段引证中共“二大”的宣言来支持他的观点。看来这个宣言的反帝话题是最投合他的思想的。

关于附录六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是陈公博所提供的六个文件中能得到中文文本的第二个文件。这个文件发表于《向导》周刊1923年6月20日第三十期，第二二八页。它已被翻译并发表在布兰特、许华茨和费正清编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七一——七二页。陈公博的译文是直译的，但他用来表达共产党名词的英文单词不一定都是今天使用的那些单词。

从《向导》所发表的宣言文本中可以看到某种歧意。在

第二段结尾的地方，陈公博使宣言的内容成为："……这些苦难都极沉重地落在老百姓身上，他们除集中努力于共产主义形式的政治之外，别无解放自己的出路。"（着重点是作者加的）而《向导》的说法是："……除集合国民自己之势力，做强大的国民自决运动……"。这种有重要意义的不同之处，可以用这样的假设来解释：陈公博有另外一种中文文本，其中谈到"共产主义形式的政治"，而不是更为合适的"民族自决运动"。这两种说法在中文里很不相同，所以假设它是错译，似乎不象。

我发现一个未经翻译的词语，是谈吴佩孚和肖耀南煽动的四川内战的，并有一处粗率的翻译，把"社会革命分子"译成"在社会上的革命分子"。陈公博曾把Honan（河南）译成Hunan（湖南），而他用罗马字书写的方式也有点古怪。其他变异的地方无疑还有；陈公博甚至在引证自己所提供的附录时，也有不确之处。但除"共产主义形式的政治"这个重要的地方外，整个译文还是妥当的。



三、感　想

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发现陈公博叙述中国共产主义早期历史的资料是令人兴奋的。历史学家都对从前的事实真象感兴趣。这儿是一块在一个领域中包含着某些事实真象的天然金矿石。在这个领域内，主观性以及为便利当前而修改过去历史，都已完全成了风气。陈公博的论文所以重要，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写于1924年，随后即被完整地收藏起来有三十多年之久，未经修改家之手。

论文中最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是四个附录，即附录一、二、四、五。这四个附录看来是中国共产党自它的最初一年起就注明日期的可靠的文件。就我的推断，这些文件别的历史学家都还未曾得到过。这些注明日期为1921年7月第一次代表大会和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使我们洞察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性质。它们还提供了该党成熟过程的确证。

“第一个纲领”实际上是一个原始的党章，与注明是二大党章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章程》相比较，它是质朴的。后者尽管简单，但却给依赖于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画出了一个组织上有条理的、等级制度的和有纪律的党的轮廓。

对比1921年《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与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两个文件，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甚至更加明显。头一个文件没有为决议案提供理论基础，它所提的关于行动的六个问题也很

少详述。对比之下，第二个决议案则充满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发，党的行动方针也有明确详细的说明。我们清楚地看到，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的意图，是要成为一个组织牢固的有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准备与中国其他政治团体联合起来，共同造帝国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反，但在此后却要致力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即使这个党处于它的形成时期，一年的变化也是明显的。

因为这个共产主义运动是秘密的，图谋反叛的，而且一开始就公然提出自己对中国当局和西方当局的反对，看来它的早期活动遗留下的有文件痕迹的东西是很少的。所以发现注明这种日期的四个基本文件（长期以来共产党人自已认为这些文件已经丧失）并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陈公博在写这篇论文时扮演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角色。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暂时多少有点独立。他已经离开了共产主义运动，但还未参加国民党。虽然如此，他受1922年共产党所宣传的思想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同时他又对孙中山的改革计划产生了兴趣。这种结论可以从他的论文推断出来，而他的可以找到的传记和自传资料也支持这种结论。

陈公博是一个强烈的青年民族主义者。这是很清楚的。他的基本的思想结构是用经济解释历史。他接受了帝国主义是中国问题的根源的学说。他也接受了中共对自己的存在所作的解释，即："共产主义萌芽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土壤"。他对共产党1922年决定与国民党联合的原因的解释，追溯到（可能是不自觉的）列宁在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所提出的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提纲。

陈公博在说明中国近代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时颇乏独创性，因为大部分都是对他所提供的文件的引证和释意。他个

人所知道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很多事，并未透露。例如我们知道，共产党早期的大部分领导人如陈独秀、李汉俊、周佛海、张国焘、毛泽东、谭平山、张太雷，他都认识，但他连一个共产党人都未提到，他也没有提到他与马林和越飞会晤的事。他的论文从未暗示组织共产党的过程中俄国或共产国际的帮助，虽然后来这种联系并未被人隐瞒过。陈公博提出了党内关于政策的一些争论，但提供的细节很少，并保持着一种超然的立场，虽然我们现在知道，他在某些争论中是一个意见强烈的人。这种沉默，根据忠于同志的原则，根据一个外国学生应当谨慎，应当对于他曾经是一个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事实保守秘密的原则，是容易解释的。

陈公博的论文虽然对内部情况保持沉默，但某些细节仍是有价值的。例如他提供了三个确切日期：7月20日是1921年"一大"开幕的日子，7月16—23日是1922年"二大"开会的日期。它注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日期是1922年5月2—6日。头两件大事它注明的地点是在上海，第三件是在广州。

陈公博清楚地指出了1919年"五四运动"与出现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他对比"二大"通过的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说明了"一大"对其他政治团体所采取的排斥和敌视的态度，并正确地把这种变化归因于中间插入的东方劳动者代表大会的影响。他对"一大"的一个宣言从未发表过的解释（因为对于党对孙中山的态度有争论）是新的资料。如果我们注意仔细阅读，就会知道许多关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东西。

总之，陈公博的论文及其所提供的文件，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说，是重要的，但也只限于党的创建的头一年。关于1922年7月以后的发展情况，它们能够告诉我们

的不多。

在读这篇论文时，我被作为一个预言家的陈公博所打动。这里有他在1924年所做的四个预言。

在绪言的结尾，他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虽然还年轻，但它已非常迅速地风靡全国。它是否走和俄国同样的道路，是有疑问的……人类能够改善自已的环境，但他们不能完全逃避开环境加给他们生活的影响。所以不管中国的共产主义成就有多大，最后中国还是中国，就象俄国是俄国一样，而且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将采取与俄国不同的另一种形式，这就是我的看法。"①

在重新估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激进情绪的发展之后，陈公博说，"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的胜利。"②

关于国共合作，正象陈公博所说的，在鲍罗廷的指导下刚刚在巩固，但他注意到，"这两个政党的合作无疑是值得未来的历史学家注意的重要而伟大的变化。现在这两党既在华北也在华南进行着斗争。他们的计划能否实现，这有赖于两党的坚持和耐心……"③ 然而，陈公博已预见到两党不可避免的分裂。"他们之间友谊的破裂迟早都会来到，但现在说这种分裂已经开始则为时过早。在国民党取得胜利时，他们就要与共产党破裂。预言一个突然的变化是轻率的。这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④

陈公博的最后一个预言是以引用"二大"宣言的一段话作出的。他用这段话结束了他的论文："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

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贫困和痛苦。……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贫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⑤

当陈公博写这些令人感兴趣的预言时，他不过是在美国大学学习的一个三十一岁的报业人士。第二年他就投身于使人眼花撩乱的政界。二十年后的悲剧性的死妨碍了他，使他看不到他这一切预言的应验。

四、注　　释

一、论文的作者

①《寒风集》是一本稀缺的书。这本书出版时，陈公博是日本保护下的南京"傀儡"政府的领导人之一。这部作品包括下列内容：甲篇（314页）大部分是自传性的：《少年时代的回忆》，写于1935年；《我的生平一角》，写于1933年；《军中琐记》（关于1926年"北伐"的），写于1936年；《我与共产党》，写于1943年；《改组派的史实》，写于1944年；《补记丁未一件事》，写于1944年。乙篇（69页）大部分是文学作品：《我的诗》、《偏见》，写于1943年；《了解》，写于1943年；《贫贱交与富贵交》，写于1943年；《不可为的官》，写于1943年；《上海的市长》，写于1942年；《海异》，写于1943年。后跋的签字是1944年10月。

②陈公博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时所填写的生日各个时期各不相同。第一次，1923年2月28日，他填的是"1891年8月28日"，生于广州。1923年9月27日注册时填的是"1891年9月29日"。最后一次在1924年9月，他只填了"1892年"。见哥伦比亚大学注册登记簿，微型胶卷，第三卷，1912—1926年毕业生登记簿。

在《寒风集》中，在特定的事件发生时有几次他用"岁"说明他的年龄。如果他是用这个词表示"虚岁"（按照虚岁，一个孩子生下来，过第一个阴历年就是两岁），那么他就是生于1892年。

陈公博家族的一位成员告诉我，按阴历算，陈公博生于龙年的8月29日。按照1910年上海出版的黄伯禄所编《中西年月对照表》，1892年阴历的8月29日是阳历10月19日。

可以假设，陈公博在哥伦比亚大学第一次注册时，他知道他的生日是阴历8月28日或29日，只不过把阴历的8月说成是阳历的8月，而在第二次注册时把它说成9月。他为何一次说28日，下一次又说29日，这是一个谜。可能他也不明确如何换算他的出生年月。

③《寒风集》，甲篇，第2—9页，313页。承蒙陈公博家族的一位成员告诉我，陈家原系客家人。陈公博在回忆录中并未说他是客家人，但他能随便说客家话。上杭和乳源都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有关陈公博父亲革命活动的记载，见《寒风集》甲篇第2—8页和284—314页。

④上学：见《寒风集》甲篇，第2、11、20—23页。在香港的生活：见《寒风集》，甲篇，第9页。

⑤《寒风集》甲篇第12—13、24、194—195页。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注册中，他说他1913—1917年在广州法政专门学校读书，但在《寒风集》中，有几次提到他在法专三年。

⑥在这个问题上突出的著作是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60年版。

⑦《寒风集》，甲篇，第196—197页。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上海，1947年版，第124页。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纽约，近代图书馆，1944年版。

⑧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95页。

⑨《寒风集》，甲篇，第197—198页。1943年他写这篇文章时，已与日本合作，不知这是否使他机敏地把自己与"五四"运动反日的牵连减少到最低限度。

⑩《寒风集》，甲篇，第200—203页。

⑪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48页。

⑫《寒风集》，第203页。

⑬《寒风集》，甲篇，第204页。根据一本大概是写于1926年下半年的内部读物《中国共产党简史》，陈独秀到广州后，组织了广州小组，吸收了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这就与陈公博的回忆说明不同，陈公博的回忆说，陈独秀到广州时，党组织已开始进行工作。参看韦慕庭与夏连荫编的《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56年版，第50—51页。（以下简称韦慕庭、夏连荫所编文件。）

⑭《寒风集》，甲篇，第205页。

⑮《寒风集》，甲篇，第214—228页。

⑯《寒风集》，甲篇，第217—219页。这里有一个显然是严重的错误。斯里佛烈（Slevelet）一定是斯内夫利特（Sneevliet），这是一个荷兰的社会主义者，曾创建爪哇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这个党不久就成为印尼共产党。他从

爪哇被驱逐后，有几年是共产国际的远东专家，使用的名字是"马林"。（休·塞顿-沃森：《从列宁到马林科夫，世界共产主义历史》，纽约，1953年版，第135页，注1；139页，注2。）伊罗生曾就他在中国的任务访问过马林，作了同样的论证。（见《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版，斯坦福大学，1951年版，第58页注。）又见罗伯特·诺斯：《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斯坦福大学，1953年版，第19页。）但根据许多记载，马林曾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100页。一大的参加者董必武说："两个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一个是荷兰人，我们用中文叫他马林。"见尼姆·韦尔斯（海伦·福斯特·斯诺）《赤色骚动》（斯坦福大学，1952年版，第39页。）陈公博也是一大的参加者，他提到他在被破坏了的第四次会议上看见马林。（见《寒风集》，甲篇，第206—208页。）马林确曾在1921年在桂林拜会过孙中山，大概是两次。一次是8月或9月，一次是12月25日。（见韦慕庭、夏连荫所编文件，第139、497页，注7和注8。）〔这是未经妥善校正的说法。1921年8月和9月，孙中山在广州，不在桂林。我无法断定他当时是否见过马林。根据《国父年谱初考》（台北，1959年3月29日，第二版）第518—520页，孙中山在大约12月23—25日确曾在桂林会晤过马林。1965年8月韦慕庭加注。〕（方括弧内的话是作者在本书再版时加的，下同。——译者）

陈公博说他曾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看见过马林，他为何没有把马林与他曾在广州和张继一起会晤过的"斯里佛烈"认为是同一个人？假定他的记述是事实，那么下面的解释看来就是可能的："西门博士"可能不是斯内夫利特，只不过在他写回忆录时认为是这样。可能陈公博在二十多年后写回忆录时忘了他们是同一个人。也可能在李汉俊家晚上那次被破坏的会议上（那次会议只开了几分钟），他没有把马林看清楚，所以没有认出马林就是"斯里佛烈"。斯内夫利特可能在他的华南之行中假扮作"西门博士"，因而陈公博没有认准他就是马林。

张继在他的著作《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1951年版）中未提到这件事。张继的著作中有大段的日记和一篇概略的自传，不过我们也不应对下述事实感到奇怪：张继不提他所扮演的把国共两党撮合在一起的角色。这是因为后来他是党内合作的最有力的反对者之一。〔这是未经妥善校正的说法。我虽未找到张继关于这一特定事件的记述，但自写了前面那段话以后，我已找到几段话，其中张继随便承认他对马林的友谊，以及他在把马林介绍给孙中山时所扮

演的角色。见以上所引著作第195、433页，及台北1952年版的《张溥泉先生传记补编》第109页。1965年8月韦慕庭加注。]

⑰《寒风集》，甲篇第220—222页。这一节在沈云龙的《中国共产党之来源》(台北，1959年版)中被广为引用，见该书第17—18页。

⑱《寒风集》，甲篇，第222页。

⑲关于这次叛乱的叙述，见李剑农：《中国政治史，1840—1929》邓嗣禹与杰里米·英戈尔斯编译，普林斯顿大学，1956年版，第415—419页。孙中山乘船赴上海大约是8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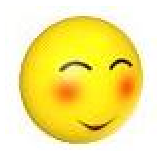
⑳《寒风集》，甲篇，第223—224页，改组国民党的会议9月4日举行，见韦慕庭、夏连荫所编文件，第141页。

㉑《寒风集》，甲篇，第225—227页。

㉒陈毕祖(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忆录》，见《共产国际》，美国版，第13卷，第10期，1936年10月，第1361—1366页。又见英国版，第13卷，第9期，1936—1937年9—10月，第593—596页。拼法和意译略有不同。两种版本的罗马字拼法都需要校正，因为它们是从俄文改写成英文的。张国焘的叙述经允许引自他的自传手稿第6本，第3章。



㉓日本外事协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东京，1933年版，第372页。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现代中国人物传》，东京，1928年版，第215页。波多野乾一：《最新中国人物传》，第599期，第52卷，第10号，特刊，1937年10月，附录，第19页。我不知道说陈炯明将军和陈公博同姓都是客家人有什么意义。



㉔李剑农：《中国政治史》，第419页。韦慕庭、夏连荫所编文件，第61页。张国焘自传，第5本，第3章。沈云龙：《中国共产党之来源》，第18—19页，22—23页。引用各种资料是为了表明，陈独秀本人就赞成陈炯明，而不赞成孙中山，而且在1921年12月马林去桂林会见孙中山之前，他曾把马林介绍给陈炯明。沈先生的著作还对此作了适当的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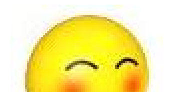


㉕写完以上内容后，我收到吴相湘教授的一篇有趣的文章：《陈炯明与俄共中共关系初探》(中文)(《中国现代史丛刊》，第2卷，台北，1960年，第97—118页。)这篇使用了许多文件资料的研究文章虽未涉及陈公博的立场，但却表明，陈炯明在1922年6月16日政变之前，即已被马林和陈独秀所追求，并受到共产国际机关报的称赞。他提倡社会主义，赞成组织工会，而且显然已被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认真考虑作为一个可能的同盟者。



㉖《寒风集》，甲篇，第229—230页。陈公博在《国民革命的若干错误》





一文中，对于他和越飞的谈话作了内容非常相似的叙述。（见《中国每周评论》，第44期，1928年5月26日，第398—402页。）对这件事也有记述的，有汤良礼的《中国革命内幕史》（伦敦，1930年版，第157—158页。）和《汪精卫：政治传记》（北平，1931年版，第78页。）越飞抵达日本大概是在1923年1月末，这意味着陈公博与越飞在热海会晤前在日本已度过了两个月。

㉗引自前述《注册登记簿》。

㉘《寒风集》，第231—236页。

㉙对于陈公博后来的经历，除《寒风集》外，我还使用了下列资料：

贾逸君：《中华民国名人传》，北京，1937年版，第一卷，第99—100页。

日本外事协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372页。

亚洲问题调查会：《最新中国要人传》，大阪，1941年版。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现代中国人物传》，第215页。

《中国现代名人录》，上海，1928、1931、1933年版。

《中国年鉴》，上海，1929—1930年及以后。

《日本现代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1940—1941年》，东京，1941年版，第66页，35—37页。

汤良礼：《中国革命内幕史》，《汪精卫》。

陈公博对他1925—1927年的一些个人经历的详细叙述还见于：

前述《国民革命的若干错误》；和《所谓左翼》。

（载汪精卫等：《中国的国民革命：论文及文件》，天津，1931年版，第81—93页。）

1936年，陈公博写了《四年从政录》，这本书有他1932—1935年在国民政府任实业部长时的120页的实录。

㉚《中国年鉴》，第928页。

㉛陈公博：《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上海，复旦书店，1928年12月15日。我原想这部著作会包括他的硕士论文的中文本或其中的几个文件，但并未包括。他在第一页上叙述了从1920年起他要对中国历史从经济上作新解释的计划，当时他就在广州《法政学报》上发表了一个大纲。随后他于19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只以经济为背景分析了辛亥革命，并用英文写了一本书：《中国最近的社会运动》（推测陈公博为什么在1928年要隐瞒他的硕士论文的真实题目和实质，是很有趣的。）他说，直到1928年他才又有机会转而着手他的这本书，但即使

到那时，也因为缺少参考书，他的著作还只是一个提纲。按照陈公博对革命所下的定义（一种经济崩溃与群众激烈行动相结合的运动），只有在秦代、隋代、元代和明代才有真正的革命。因此他对这几个时期都以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首先讲经济崩溃，然后讲群众造反。他并未往下讲述民国时期的革命。

二、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

①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时代背景》第410期（1956年9月25日）中，找到一份中共官方历次代表大会一览的摘要，以及对这些大会成就的叙述，其中最有用的，是1952年9月1日《学习》杂志上裴桐所写的一篇文章。

②引自陈潭秋回忆录，前述《共产国际》第1961—1962页。

③海伦·福斯特·斯诺：《赤色骚动》，第39页。

④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57页。

⑤周佛海：《往矣集》（回忆录），上海，第10版，1944年8月。周佛海关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的回忆可在这本书的一篇叙述他在日本学生时代的文章（第21—46页）中找到。我的叙述是根据苏珊·汉·马什夫人的注释写的。我很感谢她让我看到这些材料，周佛海对这次大会的叙述在这本书的第30—32页。这段话在沈云龙的《中国共产党之来源》中被详细引证。引自第10—12页。

⑥《纽约时代杂志》，1953年8月2日，第46页。

⑦这段叙述是根据张国焘手稿的第2本第6章，蒙伯顿先生供我使用，据说张国焘有一本相当早的作品《中国的共产主义》，1927年12月查抄广州苏联领事馆时被没收，部分译文发表在1928年2月4日《南清早报》上。（见诺斯：《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第55页，注12。）这条材料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图书馆的J·休斯顿收藏品中可以找到。其记载有些有意思的资料，但错误很多，可能是因为译文糟糊，如1922年的大事都注明是1921年。

⑧韦慕庭、夏连荫所编文件，第52页。

⑨余昂礼（音）：《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共产国际》美国版，第6卷，第9—10期，（1929年3—4月），第422—427页，425页。

⑩王明（陈绍禹）：《中国人民为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十五年》，《共产国际》英国版，第13卷，第9期（1936年9—10月），第581—593页，581—582页。

⑪《寒风集》，甲篇，第205—212页。陈公博的有些叙述重印在沈云龙的《中国共产党之来源》中，引自第15—16页，

⑫见陈公博论文，第98页。

⑬引自陈潭秋回忆录，前述《共产国际》第1362—1364页。

⑭周佛海：《往矣集》，第30—32页。

⑮《寒风集》，甲篇，第206—208页。

⑯海伦·福斯特·斯诺：《赤色骚动》，第39页。

⑰张国焘手稿，第2本，第6章。

⑱肖瑜（肖旭东）：《毛泽东和我都是穷人》，锡拉丘兹，1959年版，第198—203页。他所讲的故事有很大的夸张。特别可疑的是直接引用几十年前所进行的对话，以及他自称有先见之明。例如在第199页，在从火车（站）向嘉兴走的时候，"我冥想，这个沉静的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要产生一个巨人，中国共产党。"又如，當昏时会议还在进行，他在湖边漫步时想："我感到惊奇，是什么妙手注定来创造中国共产党。湖中的流水使我想起圣经上所说的诺亚的大洪水，如果共产党主宰了这个国家，新的洪水就要席卷古老的中国——这混浊的，浓浓的祸水。"！

⑲《寒风集》，甲篇，第212—213页。

⑳《字林周报》，第140卷，1921年8月6日，星期六，第407页。该报所记录的7月30日和31日的温度是99.2度和96度，7月31日的雨量是0.08时。（同上，第448页。）

㉑从引自陈潭秋、董必武和张国焘的所有这些话，我们知道，一大代表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小组；邓恩铭和王尽美来自山东济南；李汉俊和李达来自上海小组；董必武和陈潭秋来自湖北的武汉；毛泽东和何叔衡来自湖南长沙；陈公博和包惠僧代表广州，周佛海代表在日本的中国同志，由于罗马拼音的不同，引起了一些混乱。张国焘在他的自传手稿中举出包惠僧来自武汉。从一些材料中我们知道，有两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荷兰人，化名斯内夫利特）和維经斯基（俄国人）在代表大会期间参加了会议。陈公博提到他在被警察打断了的那次会上看到他们。他还说张国焘依靠这两个俄国人的指导。（《寒风集》，甲篇，第206—207页。）董必武记得他们参加了会议，但忘了那个俄国人的名字，张国焘否认他们两人参加过代表大会的任何一次会议，并说马林是有意被排除的，因为有两个中国代表讨厌他。他被邀请出席在李汉俊家晚上那次会议，是因为他要向大会讲关于党章的事。这就是被警察中断了的那次会议。陈公博与张国焘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合，显然渐渐互相憎恶起来。

㉒韦慕庭、夏连荫所编文件，第53页。

㉓海伦·福斯特·斯诺：《赤色骚动》，第40页。我认为董必武提到"关门"政策时说的是党员能否成为其他党的党员或与其他政党合作的问题。按照陈公博关于代表大会的叙述，代表大会曾决定"不许与其他党派或团体发生关系"，党员也不能保留其他党派或团体成员的资格。陈潭秋、张国焘《简史》都未提到这种争论。陈公博在他1943年所写的回忆文章中详细地讲了这一点。他说他反对这一决议，但会议主席张国焘坚持要通过这一决议，其他代表只不过附和他。但在下一次会上，张国焘根据俄国代表的劝告，又提议取消这一提案。这使陈感到恼怒，他质问，为何不召开任何大会讨论，为何只听俄国人的命令？（《寒风集》，甲篇，第206—207页。）

㉔见陈公博论文，第102页。

㉕海伦·福斯特·斯诺：《赤色骚动》。

㉖陈潭秋回忆录，前述《共产国际》第1364页。

㉗《寒风集》，甲篇，第207页。

㉘附录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载《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第二版，（无出版地点）中共中央，1926年10月10日，第1—23页。这本书收藏在国会图书馆（有趣的是这部党的文件集没有一大的一个文件）。这个宣言又见于朱其华（朱新繁）的《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两卷集，上海，1930年版，第1卷，第259—280页。其中遗漏了最后一段和口号。没有口号的最后一部分出现在日本外事协会编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第95—97页；这一片段的译文收在布兰特等编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中，第63—65页。

附录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载于上述中文的文件集，第45—47页，又见《向导》周刊1923年6月20日，第30期，第228页。又见于布兰特等编的《文献史》，第71—72页。日文本见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东京，1931年版，第87—88页。

㉙韦慕庭、夏连荫所编文件，第52页；陈潭秋回忆录，前述《共产国际》第1363—1364页；张国焘手稿；周佛海《往矣集》第32页；董必武谈话（海伦·福斯特·斯诺：《赤色骚动》，第40页。）

㉚《寒风集》，甲篇，第208—211页。

㉛陈潭秋回忆录，前述《共产国际》第1363页。

㉜同上，第1366页。

㉝韦慕庭、夏连荫所编文件，第53页。

㉞尤丁、诺斯：《苏俄与东方，1920—1927年》，第84—85页，138—139页。

㉟同上，第139—140页，译自B·Z·舒米亚茨基：《论中国青年与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国青年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见《革命的东方》，第4—5期，1928年，第194—230页，216页。尤丁、诺斯《苏俄与东方，1920—1927年》一书的引用得到该书出版者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允许。

㊱威廉·E·拉帕德：《关于欧洲政府的资料》，纽约，1937年版，第5部分《苏俄政府》（塞缪尔·N·哈珀编），第7—33页。又见詹姆斯·H·梅塞尔和爱德华·S·科泽德编：《苏联制度研究资料：国家和党的宪法、法律、法令、决定，及领导人的正式声明的译文》，修订版第二版，安阿波尔，1953年，第65期。

㊲韦慕庭、夏连荫所编文件，第41—57页，尤其是54—57页。

㊳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时代背景》，第410期，1952年9月1日《学习》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㊴韦慕庭、夏连荫所编文件，第60页。"第二次代表大会快闭幕时"，大会文件的文本可能也翻译了。

㊵同上，第58页。帕威尔·A·米夫：《英雄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年》，纽约，1937年版，第14页。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海，1940年版，1947年重印，第2卷，第51页。《文献史》，第30页。

㊶张国焘自传手稿，第5本，第3章。张国焘不单是靠记忆，他有许多文件和历史著作可用。

㊷见陈公博论文，第155页。

㊸引自尤丁和诺斯的著作，第145—147页，221—231页。艾伦·S·惠廷：《苏联的对华政策，1917—1924年》，纽约，1954年版。其中的第78—86页提供了一段关于这次代表大会处理中国问题的生动叙述。

㊹引自尤丁和诺斯的著作，第227—229页。引用得到该书出版者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允许。

㊺引自韦慕庭、夏连荫所编文件，第492页，注18。又见即将出版的张国焘先生的回忆录。但惠廷对这次大会及共产国际关于1922—1923年中国问题报告的仔细研究表明，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意见是各种各样的。

㊻收入布兰特等所编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的二大宣言，是从日文文

本直译的，与陈公博的译文一致。又见韦慕庭、夏连荫所编文件，第59页，其中讲到《简史》的近似的文本，该文本是从俄文回译成中文，并译成英文的。

㊽引自尤丁和诺斯的著作，第121—130页；惠廷的著作，第155—178页。

㊾引自尤丁和诺斯的著作，第147页。

㊿陈公博论文，第96—97页。

㊿参看本书第68页，注28。

㊿引自《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第23、39页。

㊿朱其华：《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第一卷，第280页。

㊿《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无出版地点，中共中央，1922年6月17日。参看韦慕庭、夏连荫所编文件，第575页。该文本与布兰特等所编《文献史》收入的选自一本俄文杂志的译文有差异（见该书第54—63页）。俄文译文缺少一大段文字（在59页），这段文字是说解决中国分裂问题的各种建议无用的。

㊿韦慕庭、夏连荫所编文件，第82—83页，493页注19；以及书目，第575页。我们因此颠倒了布兰特所编文件集中这两个文件的次序。共产党挑选国民党为革命同盟者的主张是模棱两可的：6月份，在陈炯明反对孙中山政变的消息传到中央委员会之前，它可能是把国民党看作一个同盟者，但到7月间，当孙中山的命运一时处于衰落并被孤立在一条军舰上时，共产党的态度可能要暧昧得多。

㊿陈公博论文附录三（译文的附录三略——译者）。

㊿同上。

㊿同上。

㊿参看《简史》的有趣的叙述，见韦慕庭、夏连荫所编文件，第60—61页。

㊿本书第147页。

㊿根据布兰特等所编《文献史》中的年表（第30页），和唐彼得：《今日的共产党中国》（两卷本，纽约：普拉格，1957—1958年版）第2卷，第4页。两个年表都有许多错误。

㊿本书第132—133页。

㊿德里克·J·R·斯科特：《俄国的政治制度》，伦敦，1958年版，第137页。

㊿与1925年12月苏联共产党第14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相比较，表明在结构上有重要的相同之处。参看沃尔特·拉塞尔·巴采尔：《俄国的苏维埃帝

程》，纽约，1929年版，第699页，735—754页。

⑭韦慕庭、夏连荫所编文件，第83页，140—141页，以及注释；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坎布里奇，1951年版，第40—45页；布兰特等：《文献史》，第52—53页；熊彼得著作，第1卷，第33—34页。张国焘的自传手稿所言，马林设法使中共在杭州召开了中央全会，并坚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因为孙中山只同意这种形式的合作。但他把杭州的中央全会的召开日期说成是8月初，在孙中山到达上海之前。中央全会之后几天，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和张太雷都经孙中山主持的入党仪式正式加入了国民党，而按张国焘先生的说法，他当时不在上海。（引自张国焘手稿，第5本，第3章。）

㊺本书第136页。

㊻附录三（译文附录已略——译者）；附录四，本书第143页。

㊼本书第121页。

㊽韦慕庭、夏连荫所编文件，第66页；《向导》周刊第30期，1923年6月20日，第228页。6月是今天共产党的历史学家所接受的日期：参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时代背景》第410期所引材料。

三、感　　想

①本书　第85页。

②同上，第97页。

③同上，第118页。

④同上，第121页。

⑤同上，第125页。

五、参 考 书 目

巴采尔：《俄国的苏维埃章程》，纽约，1929年版。

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

张　继：《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中央文物社，1951年版。

张国焘：《自传》，未发表的手稿，1958 年。《中国的共产主义》，见《南清早报》，1928年2月4日。（1927年12月从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所查抄文件的部分译文，被认为是张国焘所写。）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J·休斯顿藏品。

陈公博：《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上海，复旦书店，1928年。

《寒风集》，1944年版。

《所谓左翼》，载汪精卫等：《中国的国民革命：论文和文件》，北平，中国联合出版社1931年版，第81—93页。《国民革命的若干错误》，《中国每周评论》，第44卷，1928年5月26日，第398—402页。

《四年从政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1937年第2版。

陈半祖（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忆录》，《共产国际》，美国版，第13卷，第10期，1936年10月，第1361—1366页；英国版，第13卷，第9期，1936年，9—10月，第593—596页。

陈绍禹（王明），《中国人民为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十五年》，《共产国际》英国版，第13卷，第9期，1936年9—10月，第581—593页。

贾逸君：《中华民国名人传》，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两卷。

周佛海：《往矣集》，上海，第10版，1944年8月。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
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40年第三次印刷。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无出版地点，中共中央，1922年6月17日，14页。
朱其华（新繁）：《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两卷，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
哥伦比亚大学，注册登记簿，微型胶卷第3卷，1912—1926年毕业生登记簿。
尤丁和诺斯：《苏俄与东方，1920—1927年：文献评述》，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现代中国人名鉴》，东京，1928年版。
波多野乾一：《最新中国人物传》，第599期。第52卷，第10期，1937年10月，特刊，附录。
肖旭东（肖瑜）：《毛泽东和我都是穷人》，锡拉丘兹，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
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两卷，上海，图书出版公司，1940年版。1947年重印。
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版，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
李剑农：《中国政治史，1840—1929年》，邓嗣禹和杰里米·英戈尔斯编译，普林斯顿，D·范诺斯特兰德公司，1956年版。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见《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第2版，无出版地点，中共中央1926年10月10日，第1—23页。
梅塞尔和科泽拉：《苏联制度研究资料》，修订版第2版，安阿波尔，密执安，G·瓦尔，1953年版。

帕威尔·A·米夫：《英雄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年》，纽约，工人图书出版社，1937年版。
日本外事协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东京，1933年版。
诺斯：《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
拉帕德：《关于欧洲政府的资料》，纽约，D·范诺斯特兰德公司，1937年版。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东京，1931年版。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
斯科特：《俄国的政治制度》，伦敦，1958年版。
塞顿－沃森：《从列宁到马林科夫：世界共产主义史》，纽约，1953年版。
沈云龙：《中国共产党之来源》，台北，1959年版。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纽约，1944年版。
海伦·福斯特·斯诺（尼姆·韦尔斯）：《赤色骚动：中国共产党人自传》，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
汤良礼：《中国革命内幕史》，伦敦，乔治·拉特利奇－森斯有限公司，1930年版。《汪精卫，政治传记》，北平，1931年版。
唐彼得：《今日的共产党中国》，两卷，纽约，普拉格，1957—1958年版。
日本东亚问题调查会：《最新中国要人传》，大阪，1941年版。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时代背景》，第410期，1956年9月25日。
惠廷：《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
《中国名人录》，上海，《中国每周评论》，1928、1931和1932年版。
《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1940—1941年》，东京，1941年版。
韦慕庭和夏连荫编：《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

件，1918—1927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
吴相湘：《陈炯明与俄共中共关系初探》，《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二册。
余昂礼（音）：《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建立》，《共产国际》，美国版，第6卷，第9—10期（1929年3—4月），第422—427页。

第 二 部 分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陈 公 博

绪　言

中国经济的基本变化

在这次世界大战的艰苦与紧张时期，俄国从黑暗的专制独裁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匈牙利起而仿效，只是被协约国军队的力量迫使它暂时回到了哈普斯堡王室的控制之下；德国和奥地利都告别了它们强大的君主政体，成了由社会主义者执政的共和国，而且群众不断地敦促要把工业彻底社会主义化。在英国，工党在大战结束时成了议会中主要的反对党，随着工人运动更加统一于工业方面，一心要彻底重建现有的工业秩序。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取得立足点的每一个国家，群众为产业民主，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在此期间都获得了日益增长的势头。在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内部，都显示出一种重大的变化，这就是比战前所持的激进得多的立场。中国也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虽然它在经济上远比其他国家落后，但也必须与共产主义会合。

中国变成现在这种状况，是资本主义影响的结果。"在这个国家与经济上顽固不化的民众进行贸易，通常是颇有利润可赚的，"索尔斯坦·维布伦在《商业理论》中解释说，"特别是贸易有足够的武力作后盾的时候是如此。但这些民众通常并不乐意与文明人保持持久的贸易关系。为了贸易与文化，他们有必要保持这种行为的文明准则，以便使贸易易

于进行和有利可图。”自从资本主义贸易进入中国以来，中国已变成了殖民政策和厚利贸易的一种牺牲品。

帝国主义是随着1839年英国舰队的侵略行动而开始进入中国的，那是一种极端的海盗行径。这种行动的主要原因，是英国政府和英国商人决意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①这种“鸦片战争”开始时并不是没有遇到来自某些方面的尖锐批评。有一位博士名叫阿诺德，曾写信给他的一个朋友说：“在我看来，普通的征服战争远远比不上为坚持走私而进行的战争那样邪恶，而且这种走私是由推销败坏道德的毒品构成的，中国政府要阻止这种毒品，而我们为了谋利却以武力推销它。”

在外国势力日益增长的八十年间，中国实际上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帝国主义者不仅占领了中国广阔的领土、岛屿和保护国作为它们的新殖民地，而且掠夺了许多中国港口，以建立外国殖民区，最后，把中国分割成了若干势力范围，进一步剥夺中国。在中国，三分之一的铁路为外国债权人所有，其他的也都直接间接地为外国债权人所控制。外国轮船在中国港口和河流自由航行，中国的邮电事业受到严密监督，关税是从属的——为外国帝国主义所控制。在这种制度下，不仅便于外国人输入资本，吸取原料，而且最糟的是，中国经济生活的精髓无情地掌握在帝国主义者的魔爪中。外国资本家还占据了许多矿山，他们在上海和天津建立了不少工厂，用皮鞭驱使工厂和矿山的工人作他们的生产奴隶。同时，外国商品的进口象无情的浪潮一样涌来。②本国手工造的旧式针和钉子不得不让位给进口货。这种灾难性的影响就是生活费用的上涨。三亿农民走向贫穷，一千万手工业者逐渐变成了无产者。每次战争结束都要求中国现金赔款。二十亿

美元外债的复利，外国银行家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和广州的控制，影响了国家的经济生活，人民受到严重的折磨。帝国主义者还贿赂官僚政客，向中国派了许多顾问和传教士，并出版报纸，设立学校，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设法传播帝国主义的宣传。他们又取得领事裁判权，并在中国领土上驻扎军队和警察，停泊舰队。

此种情况，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叙述过，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萌芽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土壤。为了使这篇专题论文成为一个彻底的、从逻辑上讲是完整的东西，我愿就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成长和趋向赖以建立的经济力量作一梗概说明。按照许多人的意见，对历史作经济上的解释是没有考虑社会主义的力量。今天，正如赛利格曼教授所指出的，"那些应用经济解释问题最成功的作者……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但经济力量的深刻影响，正如赛姆霍维奇教授所说，没有一个才智之士愿意否定，而且它已教导我们对问题进行由表及里的研究。我们完全准备承认它，并以此种观点出发研究问题。

说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长，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的说法。不过我们要辨明和理解，是什么使得中国在这样多的世纪中一直保持着物质生活的低水平，并使它有这样长期的内部稳定。一切都可归结为：中国人以其所耕土地的直接的个体所有制，从事小规模的农业生产；长时期的手工业；古老乡村社会习惯的部分影响，以及永远神圣的家庭生活。保持农业生产及其对人口的抚养，作为一切繁荣的基础，加上极为重要的民族工业与商业，这便是人民全部生活的根本。自从中国的墙被外国廉价商品的重砲轰塌以后，中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就变得悲惨了。

1840年与英国所进行的鸦片战争，1856年与英法的战争，1894年与日本的战争，以及1899年的义和团之乱，把赔款增加到了五亿二千九百六十四万美元，而其他借款的总数不下于赔款的两倍。但对中国最致命的打击还是领土的租借。国际力量平衡的理论过去和现在都在远东起作用，特别是在象中国这种有独立和主权而在经济和军事上都软弱的国家。1898年，当德国在山东一地区偶然杀了两个德国传教士为借口，要求并从中华帝国政府那里得到胶州湾作为为期九十九年的租借地时，俄国要求并得到了对旅顺和大连为期二十五年的租借；法国租借了广州湾（为期九十九年）；英国租借九龙（为期九十九年），在南方抗衡法国，并租借威海卫（为期二十五年），在北方抗衡德俄两国。1905年，俄国在中国的租借地落入日本手中。作为最近这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顾中国在1919年凡尔赛和会上的抗议，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也落入了日本之手。

租借是指在商定的时期内所有权的转移，承租人每年交付给出租人一定数量的钱即租金，或者别的什么。中国虽未交出主权，但它并未得到租金，也不能对租借地的财产和人征收任何税款；对这些财产和人的征税，只能由管辖或承租租借地的强国进行。就在胶州租借地，德国曾以自然增价税作过首次成功的实验。在胶州，即使是关税收入，也不全归中国所有，有百分之二十被租借地的德国政府拿走。1914年日本攫取胶州后，中国进一步被剥夺了征收关税的权利。胶州的这种事实，在中国的其他一切租借地也都同样存在。

比租借地对中国屈辱较小的，是所谓“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这种租界是指中国政府允许有关的外国人为公用事业（如卫生设备、修路、规定建筑规章等）而设立和

保持当地行政机构。这样建立的行政机构征收税款，税收工作必须听任这些当地行政工作去完成。为了其他任何目的，都不能向他们征税，中国政府在征收税款中也没有份。虽然在一些租界中有某种形式的地产税仍由中国政府征收，但中国在这些租界中，不但是一般征税的权利，就连征收关税的权利也是落空的。目前中国在这些为外国人经商和居住的特殊地区，在条约许可之外既不能对外国产品课税，也不能对中国货物课税。

因此，中国得不到机会进行财政改革，政府清偿外国贷款本息的唯一办法，就是向人民征税，使人民濒于绝境；这必然是杀鸡取蛋。人民一方面忍受着重税的负担，另一方面又受到外国涌进的廉价商品的盘剥，逐渐变成了穷人。为了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资产阶级开始起来反抗，但因他们的力量太弱，资本太小，反而成了外国资本家的玩物；至于与外国资本竞争，那就更谈不上了。他们能够做的，或者说，不得不做的，就是压迫工人阶级，并降低他们的工资，尽管生活费用是逐日提高的。其结果，自外国列强进入中国以来，手工业者、小商店主和小业主不是破产便是失业。妇女不得不离开她们舒适的家，进工厂做工，所挣的工资远比男工为低，即使是儿童，为了糊口，也被迫站在单调的机器旁每天劳动十五小时以上。今天中国的状况，就象英国十八世纪刚进行产业革命后的那种悲惨境遇。

资产阶级不懂得什么叫劳动法；搞卫生设备的想法从未打扰过外国或中国老板们的清梦。刑法甚至认为罢工就是犯罪，不给工人阶级政治上的发言权。部分地由于这次世界大战，生活费用已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以上，但工资标准仍保持在二十年前的水平。

中国人认为辛亥革命会把他们从经济、政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但因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他们的悲惨境况依然如故，而且比以前更糟。不管是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外国资本家们照样推进他们谋取厚利的贸易。由于对辛亥革命的结果不满意，认为这次革命的效果不足以使他们免除压迫，于是中国人决定采取另外的步骤——试行共产主义。正当中国人民为寻求一条解放之路而斗争的时候，红军在俄国取得了胜利。激进思想的炸药爆炸了，共产主义风行于全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罢工遍及全国各地。有才智的学生深入到工人中，社会革命走上了迟早要胜利的道路。总之，社会革命的种子已播种在人民的心中，多久才能开花，那就看激进的园丁们的能力了。

现在我们讨论中国共产党近来的趋向。我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页感兴趣地看到："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在瑞士，他们支持激进党人。在波兰，他们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战斗。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最后，共产党人在全世界到处都努力争取……"② 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因此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这种观点，正在试图为国民革命而战斗。

在1921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不妥协的政策，认为中国的一切政党都是腐败的。他们宣告：我们应当"完全与黄色知识阶级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关

系。我们应当自己站立起来。我们应当独立斗争。我们应当避免变成其他政党的傀儡。”③但在一年以后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们修改了第一个纲领，试图与国民党合作。“各种事实证明，”二大宣言声称，“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的和比较的自由。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审察今日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且我们无产阶级相信在现今的奋斗进行中间，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④在解决共产党人为何与民主主义者联合的问题时，我们应考虑几个值得一说的问题。首先，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近代社会主义是工业制度的结果，工业制度在西方历史上起重要作用已达两个世纪之久。在其他国家几百年所发生的经济变化，在中国只有几年。民主主义所以在中国失败，是因为它成熟过早。如果共产主义也进行过速，它也会失败。再者，中国只在名义上是共和制；封建主义的残余并未清除掉。对于社会革命来说，民主作为使无产阶级为进行社会革命而成熟的手段是不可缺少的东西。民主除了不能阻止这种革命之外，它对无产阶级就象阳光和空气对人的机体一样，不可或缺。没有民主，无产阶级就不能发展它的力量。第二，中国与俄国很不相同。俄国是一个绝对独立的国家，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即是半殖民地。一切港口都为列强所占有，经济生活和政治都控制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手中，一切活动都受对中国不利的条约的限制。此外，中国的军队薄弱，舰队

的力量等于零。如果爆发社会革命，究竟对列强有利还是对中国人有利，仍是一个问题。同样明显的是，这样一种革命将会象在匈牙利一样遇到一种与之对抗的势力，或者遭到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的镇压，就象在俄国遇到邓尼金和谢米诺夫一样。

不管我的判断是否正确，共产党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修改他们第一个“孤立行动”的纲领。作为这一章的结束语，我想多说几句话。中国的共产主义虽然还年轻，但它已非常迅速地风靡全国。它是否走和俄国同样的道路，是有疑问的。正如E·A·罗斯所说，“如果载着列宁和其他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火车在穿过德国向俄国奔驰的道路上在一座桥上跌落，而且他们全都牺牲，俄国所发生的事情也会采取差不多同样的行动。”人类能够改善自己的环境，但他们不能完全逃避开环境加给他们生活的影响。所以不管中国的共产主义成就有多大，最后中国还是中国，就象俄国是俄国一样，而且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将采取与俄国不同的另一种形式，这就是我的看法。

第　一　章

中国辛亥革命的真正原因

因为要合乎逻辑地提出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成长的问题，我们将从这种叙述开始，即：中国共产主义的产生，要从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那里寻找原因。正如前面绪言所描述的那样，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除有些传教士和有些学者、作家和艺术家是仰慕中国文明之外，世界上对中国的兴趣一般说来都纯粹是经济的。只要工业国家的资本家们需要和要求剥削这些落后的国家，就不容许人道的法则在这些殖民地和弱国干扰他们的主要经济目的。外国人除过去通过武力进入中国外，现在又热切希望在中国修筑铁路，这并非因为他们认为中国需要铁路，而是因为他们要以铁路谋利。因此这就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即：一切关于互相交往、关税、治外法权、利益范围，以及修筑铁路的特许权和控制铁路的条约条款和各种协定，其基本目的都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福利，而是为了西方人能够用来经商和从中得益。

摆脱这种经济压迫对中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辛亥革命则是中国人为解放自己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推翻满清政府，在皮相的观察家看来似乎只是出于民族仇恨，而真正的原因却在于经济方面。下表支持这种定论。

赔款和战争借款

名称和来源	本金总数	利息%
香港上海借款（英）	10,000,000英镑	7
香港上海借款（英）	3,000,000英镑	6
法俄借款	400,000,000法郎	4
克萨借款	1,000,000英镑	6
南京借款（德）	1,000,000英镑	6
英德借款	16,000,000英镑	5
英德借款	16,000,000英镑	4.5
庚子赔款	450,000,000两	4

铁路借款

名称和来源	本金总数	利息%
法比借款（修筑京汉铁路）	4,500,000英镑	5
中英公司借款（修筑京奉铁路）	2,300,000英镑	5
华俄道胜银行借款（修筑上海铁路）	1,600,000英镑	5
法比借款（修筑开洛铁路）	1,000,000英镑	5
中英公司借款（修筑沪宁铁路）	2,250,000英镑	5
中英公司补充借款（修筑沪宁铁路）	650,000英镑	5
英国福公司借款（修筑道清铁路）	700,000英镑	5
香港政府借款（赎回广州—香港铁路）	1,100,000英镑	$4\frac{1}{2}$
中英公司借款（修筑广九铁路）	1,500,000英镑	5
英德借款（修筑津浦铁路）	3,000,000英镑	5

英德借款（修筑津浦铁路）	2,000,000英镑	5
中英公司借款（修沪杭甬铁路）	1,500,000英镑	5
英法借款（赎回京汉铁路）	5,000,000英镑	5
日本借款（修筑吉长铁路）	2,150,000日元	5
英德补充借款（津浦铁路）	3,000,000英镑	5
伦敦菲色尔公司及密德伦银行借款（京汉铁路开支债券）	450,000英镑	7
赎买京汉铁路借款（横滨正金银行）	220,000日元	7

一　般　借　款

名称和来源	本金总数	利息%
伊犁远征借款	1,000,000英镑	不清
台湾远征借款	2,000,000两	8
西南远征借款	5,000,000两	15
第一次海军借款（德）	2,500,000马克	$5\frac{2}{3}$
第二次海军借款（英）	16,000,000两	7
第三次海军借款（德）	5,000,000马克	5
奥地利军需借款	300,000英镑	6
第一次奥地利借款	2,000,000英镑	6
第二次奥地利借款	1,200,000英镑	6
币制实业借款	10,000,000英镑	5
第一次电政借款（大东大北公司）	210,000英镑	5
第二次电政借款（大东大北公司）	48,000英镑	5

各　省　借　款

名称和来源	本金总数	利息%
1905年直隶借款	4,800,000两	7
1909年湖北借款	2,400,000两	7
1910年安徽借款	1,200,000两	7
1910年湖南借款	1,200,000两	7
1909年湖北借款	500,000两	7
1910年上海借款	3,500,000两	4
1910年上海商人借款	2,000,000两	7
1910年江苏借款	3,000,000两	7

其结果是，正好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借款的总数达到八千二百四十四万八千英镑，七百五十万马克，六亿法郎，二百六十九万日元和五亿零二百万两白银。这个总数相当于十六亿五千万元（中国币）还多，而利息总额每年付出近八亿元。这种不堪忍受的重负都落在了中国人的肩上，这对他们是一付非常沉重的枷锁，他们当然要想出一种办法来纠正这种难以容忍的事态。此外，政府还极力试图使国家现代化，以仿效在对付外国人方面已经很有成效的日本人。为此形成了新制度，训练了新军队，开设了大学和各种学校——总之，运用各种方法提高国家的地位，以进入西方强国的行列。为了支付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新费用，一切能征税的都征到了极限。人民除承担外国借款外，还得负担国家改革所需要的税款。但中国却没有机会进行改革，因为关税控

制在外国人手中，作为借款的担保，并受协定关税的束缚，因此不能增税。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在市场上被外国工厂生产的商品所取代。一切重要港口都被外国资本家所占有。中国人因无解放自己的办法，只有转向造反。

革命成了确凿的事实，在一百天之内，满清政府就被推翻了。幸运的是共和制迅速取得了胜利，而不幸的是共和制的胜利过于迅速了。国家的政体从君主制变成了共和制，国会和内阁都形成了，所有欧洲的各种政治制度在中国都被仿效着，但经济状况却依然如故，并未因共和制而带来变化。租借地和租界照样存在，政府无法征税，也不能使财政改革有任何进展，关税仍为外国人所控制，工厂和铁路被外国资本家管理着，为了换取外国对中华民国的承认，甚至还秘密地给了外国人更多的特权。一句话，经济状况比以前更坏了。

经济帝国主义并不帮助一个共和国，在君主政体下开始的中国经济的败落，在共和政体下已完全实现。欧洲和日本不是帮助新的共和国自立，而是继续实行经济剥削的制度。外国借款已经酿成和助长了内战，而这种事态又使中国人能够在他们的军队上乱花钱，或者用较为简单直接的办法干脆把用于军队的钱装入自己的腰包。

由于人民依然忍受着税收的沉重负担，动乱遍布全国。因此就产生了两种极端的观点。保守派认为，权衡共和制和君主制下所存在的痛苦，最好还是恢复君主制，君主制在实际上或许要比共和制为好。激进派则相反，他们鼓吹，在共和制度下已证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能够用把他们的思想转向无政府状态来补救。

但中国所要的是和平安定而不是自由。正象梅特涅在法国革命之后成了有权势的人物一样，反动分子袁世凯不久也

得势了。他镇压了国民党，解散了国会，最后要把中国变成以他为皇帝的君主政体。他死后恢复了共和制，但一年之内，满清皇帝又复辟了，只不过不到一个月就被击败。保守派所倡导的，在一切方面都彻底试验过了，先是新的君主政体，然后是年轻傀儡（前皇帝）的复辟，这也失败了，至此，君主政体的迷梦才算破灭。而另一方面，国民党由于种种原因也未完全胜利。首先，革命实际上是一个过于早熟的果子。人民大约有三分之二还不很理解共和制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北方的人民。其次，封建残余还未扫除掉，那些在君主制时代就反对民主方法的人在共和政体中又得势了。最后，外国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总是愿意帮助保守派，以便把民主镇压下去，他们自己就可取得更多的特权。首先他们帮助反动分子袁世凯，答应贷款给他，然后又贷款给北方军阀。就是这些最臭名昭著的保守派，却能从外国帝国主义那里得到较大的帮助。甚至那个好听的名词"门户开放"政策，也不过是一种用语，其真意却是侵略中国。在说明这一政策时，没有人比W·E·维尔先生说得更坦率的了。他说："可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老实说是自私的。虽则我们对中国人具有慈善的感情，但只要我们自己的商人和投资者留在中国，我们的'门户开放'政策就首先对他们有利。"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如此，其他强国的帝国主义计划也同样是如此。

以上所述事实说明了1911年中国政治革命的成功和随后失败的原因。凡是保守主义失败的地方，激进主义就取得胜利，凡是帝国主义侵入的地方，共产主义就开始发生。在我们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最好先讨论一下那些开始搞这种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外国和中国的作者都不甚了解。虽然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表达的思想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但这些思想还不能认为就是近来这种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H·W·莱德勒在他的著作《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社会主义》中说："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建立于1911年。中国革命期间，共产主义运动迅速展开，大约有三十个社会主义者被选入新的中华民国的国会。这一胜利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产生了四十多种社会主义的报纸，建立了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学校和工会，广泛传播了社会主义文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剧团。1913年8月，袁世凯因怕这些宣传活动所产生的后果，下令解散这个政党，逮捕了它的领导人，并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投入监狱，处以死刑。但社会主义者继续进行秘密宣传，并在推翻袁世凯帝制和建立黎元洪领导下的新共和制的斗争中成为一种重要因素。"基尔卡普在《社会主义史》中也作了同样的叙述。

但就我所知，1911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一种乌托邦计划，与今天的实际运动无关。那时有两个团体，一个提倡社会主义，一个提倡无政府主义。前者无纲领，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俱乐部，与工会没有任何联系，它的成员也没有一个人

提出过劳工问题。有些社会主义者曾被选入国会，但他们加入了国民党，并不属于社会主义政党。后者什么都不主张，只提倡“公产和自由恋爱的原则”。他们曾申请广东政府给他们一个岛屿，让他们在岛上实现他们“新社会”的理想。由于这种理想主义的思想，我们最好还是把他们看成是乌托邦主义者，而不要看成是共产主义者。所以我们在追溯共产党的起源时，对我们来说比较实际的还是描绘1919年的“五四”运动，即大学生运动的序幕。

世界大战停战后，弱国和被压迫国家希望，象列强在战争危急时期所许诺的那样，实现它们自决和独立的梦想。但直到凡尔赛舞台的帷幕落下，这些国家才明白，他们的想望依然是一个梦。威尔逊所提的十四点建议未被采纳，列强的许诺被破坏，正义、平等和人道的假面具被弃置一边，克里孟梭和劳埃德·乔治所建立的新帝国主义又开始盛行起来。在这种新的事态中，中国未能得到什么好处，甚至山东问题也未能解决。中国被排除在五强的秘密会议之外，在所谓“英国绅士的外交”中，在列强的谅解和默许下，青岛让给了日本。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学生在外国使馆前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列强把中国从压迫中解脱出来。游行示威结束时，他们公开攻击签订日本二十一条的外交总长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和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签订山东铁路借款的章宗祥。他们包围了曹汝霖的住宅，把章宗祥打了个半死，曹陆则在警察保护下幸运地逃走了。有三十多个学生被捕，大学被置于军队看守之下，发布了戒严令，其后有两千多个学生遭捕。因监狱不够大，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学生，大学校舍遂被用来作为临时监狱，并被军警所包围。这是多么可怕和值得惊叹的情景啊！宪兵在街

上巡逻，学生向带着刀枪的士兵群发表演说。有些学生遭到大兵的殴击和鞭打，但千百个学生仍在生气勃勃地继续进行宣传和发表公开演说。学生太多了，捕不胜捕，监狱的房间不够，临时牢房又找不到。政府无力对付学生。这场闹剧结束时，宪兵不抓学生入狱，只没收他们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把碰巧前来听演说的老百姓赶到路边，而让学生到街上去演讲。但为防止混乱，入狱的学生仍被留在狱中。北京的学生派出代表到各省，到处都以“打倒卖国贼！反对日本和全世界的军国主义！”的口号来响应。全国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几千青年回到他们的家乡，把北京暴行的事实告诉乡人。学校的教室里举行了集会，全国各地的学生通过了革命的决定，他们拒绝上课。受日本势力压迫和军阀压榨的商人和知识分子同情学生，计划在天津、上海、汉口等重要商港举行罢工罢市，如果外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这样的卖国贼不撤职，被监禁的学生不释放的话。政府因怕发生政变，被迫释放了所有的学生，驱逐了曹章二人，革命风暴才暂告平息。

从那时起，这个生动的运动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把他们从冷漠的沉睡中摇醒了。这次运动看来颇具反日性质。革命斗争中热心的信徒们把它看作是即将来临的风暴的前兆。

民众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也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巴黎和会的列强抛弃了他们在伪善的假面具下倡导的不霸占领土、不要赔款的和平，策划惩罚中国，好象中国是敌国，而不是盟国。虽然中国代表未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但山东仍被日本所据有，而且中国人要求解决关税、领事裁判权和外国租界等问题的梦想也未实现。中国象正在等待着五大强国重新瓜分的巴尔干诸国一样被对待着。

成千上万的青年人被激进思想所驱使，意识到政府的软弱和腐败，知道要使中国摆脱压迫，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自己。“到民众中去”就是当时的口号。

许多学生放弃听课，到工厂组织劳工团体，酝酿罢工。女学生组织女权运动联合会，要求在诸如继承遗产、政治权利和受教育等方面的男女平等，要求废除一夫多妻制和婢女。学生们组织了很多民众学校，白天夜晚都教工人读书，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到工人中去活动，准备组成革命组织。这些运动在性质上都是分散的，但都趋向于社会革命。

对我来说，回忆这一时期的活动是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的。我处在巨大的浪潮中，自始至终目睹了这次激进的运动，目睹了群众不满情绪的加深和反抗的顽强性。此情此景在壮丽和忧伤方面与1898－1899年冬俄国大学生的总罢课多么相似！

自“五四”运动以来，组成了许多党派和团体。以下所列举的，就是共产党起源的那些团体：

1. 社会主义青年团。象第一国际一样，这一团体由各种激进的青年所组成，如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经过严肃的争辩与讨论，反对共产主义的人退却了。这个团体现在成了纯粹的共产党。

2. 工会。除一个外，所有这些工会都可以说是全国性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总工会1925年正式成立——译者）。它们有几百个都是分散的，但多数都具有工会的性质。中国工会的力量远没有欧洲同样工会的力量大，但它们的影响却在日渐增长。它们认为，中国应该步苏维埃俄国的后尘。

3. 新潮社 这个团体是杜威教授和罗素先生逗留中国

期间组织的。杜威教授提倡实验逻辑，罗素先生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但他们都教导学生如何思考问题。现在的许多共产党员就来自这个团体，而我们的思想方法和我们思考的结果已经影响了共产党。这或许是杜威教授和罗素先生所不知道的。

4．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这个学会的目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一个革命团体，而是学术团体。马克思的许多书被翻译过来了，但当这个研究会的成员认识到，只了解马克思的理论还不能满足他们的热切希望时，他们就逐渐转向实际应用。现在他们百分之九十已成了共产党员。

5．全国学生联合会。它逃避开北京政府的压迫而在上海活跃起来。该会的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各省学生都选派了代表，他们大多数都同情激进主义和社会革命。

6．女权运动同盟。这一组织已遍布全国，主要由女学生组成。她们多数都认为，苏维埃中国不胜利，妇女就得不到彻底解放。

在这些组织中，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全国总工会是最强大的，而且为革命活动也最积极。社会主义青年团已制定了它的纲领，而且在1922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关于政治、经济、教育以及与其他党派的关系等方面的许多政策。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发起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22年5月2－6日在广州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一百六十余人，大会通过了八项议案，即：

1．援助罢工议案

2．力主八小时工作制议案

3．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议案

4．关于湖南政府杀害湖南工人问题的议案

5. 订定中国劳动歌和劳动旗帜的议案

6. 尊重"五一"国际劳动节和惩罚工贼的议案

7. 在全国组织苦力联合会的议案

8. 准备工会下届全国代表大会的议案

除了上述我们认为是共产主义本源的团体外，许多其他组织都有激进的思想家。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的胜利。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第　三　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大会代表十二人，代表七个地区——广州、北京、湖南、上海、山东、天津、汉口，以及在日本的中国同志。这次大会持续了两周，选出五个委员会起草纲领、计划和宣言。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次大会，必须记住影响共产党人思想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自1918年以来延续下来的内战，给人民造成了不堪忍受的苦难。第二，由于巴黎和会闭幕，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更加清楚地表明，弱国是没有可能逃避列强控制的，被压迫国家人民求解放的梦想是无法实现的，所有各国被压迫阶级还必须继续忍受资本家政府所加给的痛苦。第三，虽然中国代表已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但山东问题仍未解决；尽管中国人民抗议，尽管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在大战中进行过援助，但青岛仍在日本手中，成为列强对日本的一份赠品。第四，在这种受压迫的情况下，不仅对于激进派，而且对于温和的知识分子来说，要把中国从内外压迫中解放出来，除了进行直接的社会革命之外，别无他途。其结果，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成员都提倡，

必须采取“不妥协”的政策。

大会通过的重要决议⑤如下：

（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

（2）采取无产阶级专政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废除阶级。

（3）推翻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及半成品等，应悉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

因为社会革命是国际的，所以他们在党员中废除了一切因国籍和性别所产生的差别。任何相信党的纲领和目标并努力为党工作的人都可成为党员。他们组织工人、农民和士兵，并采取苏维埃的形式。为了维护不妥协的政策，他们决定与黄色的非共产党组织断绝一切联系。

在第一个纲领中⑥，他们决定了若干要着手实行的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劳工组织，宣传，工人补习学校，研究劳工组织的机构，以及他们对其他现存党派的态度。

在组织产业工会方面，他们承认党的宗旨。党应当向工会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至于对现存的同业公会，技术协会，党决定派党员加入这些组织，以便采取第一个步骤，改组那些工会。但为了贯彻他们的“不妥协”政策，他们发誓要避免成为同样也面临政治斗争的其他非共产党政党的傀儡。为了在宣传工作中采取独裁的办法，他们决定一切杂志、日报、百科全书和小册子，都应置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管理和指导之下，不允许出版与党的决议和政策不一致的出版物。

工人补习学校，他们把它看作是组织工会的一种准备步

骤。这种补习学校应在一种产业的一个单位内组织，如运输工人补习学校，纺织工人补习学校等。这种学校的目标，是逐步建立工人组织的中心，以促进革命思想；所教的科目应当是那些唤醒工人觉悟，以及向他们表明需要组织工会的东西。

需要有某种研究机构以培养工人的革命理想。这种机构的目标是训练工人准备把他们的理想付诸实践，教他们如何组织工会，调查研究劳工状况。这种研究机构分成各种小组，研究工人运动的历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马克思的理论，以及各国工运的现状。

他们特别强调对其他现存政党的态度。"对其他现存政党，"第一个纲领[7]写道："应采取独立、攻击和排斥的态度。在政治斗争，反对军阀与官僚，以及要求言论、出版与集会自由时，凡必须表明态度者，本党应即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准与其他党派或团体发生关系。"他们特别强调这一点，是有种种原因的。首先，由于内战持续多年，人民陷于深重苦难与不景气之中，这就使共产党人认为，任何使人民遭受这种苦难的党派都是他们的敌人。内战的延续是可怕的，不仅北京政府，而且南方政府也应对此负责。这就表明了一个真理，中国的现存政党都不值得参加。其次，当时的许多共产党人代表了其他党派或团体的激进成份。如果他们在其他党派或团体中保留成员资格，共产党员的人格就会被败坏。第三，由于不妥协政策是他们所承认的唯一政策，独立斗争对党来说就是重要的；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组织一起活动没有用处。

最后，全党决定加入第三国际。中央委员会每月向第三国际交一份报告；必要时向其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派出代

表。

这一决议案表现了共产党在中国开始组织时期的状况，有趣的是在第二年的代表大会之前，共产党的观点迅速地改变了。

一大闭幕后，所有代表都离开上海，返回本省进行组织宣传工作。1921年底，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组成，活动多少有点公开，各省建立执行委员会的，据报超过全国的一半省份。全国都建立了工人组织，尤其是在广州，组织了一百二十多个协会，它们虽然分散，性质上象是工会，但都逐渐转向共产主义。在各重要港埠，罢工不断地发生，其中省港海员的大罢工闻名全世界，给香港和英国政府以巨大震动。

在结束这一章之前，有两三件更有意思的事或许值得一提。

在党的纲领的第十四条中，如上所述，他们禁止党员做官吏和各种议会的议员，并进一步说明，学校校长和大学校长如果是政府任命的，就被认为是官吏。这一规定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主张，教育职业不应看作是做官，而且在党还年青的时候，党员应在凡能活动的地方积极活动，不管他们是什么职业，即使是在政府职位上也好。由于持这种主张的一方拒绝被说服，这条规定留待下次大会作决定。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未能发表第一个宣言。第一个宣言的原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把这种状况的调查研究结果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所阐发的理论基础之上，极力主张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后一部分列举了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的罪恶，并说，孙逸仙博士的政府并不比北方军阀的政府好。这种说法在大会

上引起了严重的争论。有些代表争辩说，尽管国民党的纲领有许多错误观点，但它暂时还是多少代表了新的趋势。孙博士所提倡的民生主义类似国家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多数代表主张，因为很多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所以南方政府应当推翻。最后，宣言被通过，但第二天另一项议案又议决，宣言的发表问题留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第一个宣言没有公布，因而这个宣言的原稿遂不为世人所知。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它得以行使职责之前，几乎被警察迫使停止。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报，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十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四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为防止再出现这种中断，大会在警察管辖范围之外的一个著名的湖中央的船上举行，在这条被宁静动人的景色所环绕的优美的船上，作出了许多激愤和激进的决议，欢快恬静的湖水和美丽的月色都没有缓和代表们激烈的感情。

第 四 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 9 2 2 年）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在上海举行。经过一年的斗争、经验和活动，党已从幼年进入成年。党员在推理方面不再是那样随便，而是更有肯定性；他们的行动计划更少分散性，而更有系统性。十八个以上的省向这次代表大会派出代表，大会发表了一个强有力的宣言，并根据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形势的观察，提出了一个纲领，这个纲领远比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的那些方案有分析有综合。一大时的中国共产主义可以说处于少年时期。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和决议案中，有几个重要的特点应当提起注意，因为这个纲领和这些决议案与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相反。第二次代表大会抛弃了不妥协的政策，以便和国民党合作。它承认蒙古、西藏和新疆的自治，因为它们的经济状况不同。它采取了参加议会活动的做法，这是第一个纲领所不容许的。总之，这次大会表明在政策上有了重大改变，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有了巨大变化。或许有人批评说，在中国流行的不是共产主义，只不过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而已。为了对这种变化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对我们来说值得作下列详细说明。

（1）共产党为什么要参加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

为了解释他们与国民党联合的理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议事录[8]说："人类经济及政治的进化，自然造成阶级战争。封建时代与民主时代间，因为经济及政治的大变动，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的战争是不能免的。民主时代与共产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也是不能免的。人类现在的历史，正在阶级战争的奋进途中。不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大部分还未得着胜利，即民主对于封建的战争也并未终了。尤其是东方产业幼稚的国家，不但在社会习俗上，即在国家统治权上，封建势力仍然大部分存在或完全存在。在这种封建势力统治的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的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的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democrat）[9]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我们应该号召全世界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此种战争虽不能完全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却是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使工人农民到权力之路的第一步。"政策变动和提出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原因，要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中去找。换句话说，共产党已开始承认历史进化的进程。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历

史变动在中国不能缩短为几年。除了外国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压迫之外，还有国内军阀集团的压迫。每次内战都有外国帝国主义在后面指导其活动，并在行动上给以鼓励。为了驱除这两种可怕的势力，就需要参加国民党，以实现一场革命。可以认为，在推翻现政府之前，不会发生社会革命。“各种事实证明”，1922年的宣言[10]宣称，“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且我们无产阶级相信在现今的奋斗进行中间，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2）共产党要求的是什么？

因为共产党在一大通过了不妥协的政策，所以他们没有明确的要求。他们所要的是立即进行社会革命，但当他们丢弃孤立态度时，他们就把要求限制在以下这些方面。从敏锐地观察经济状况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这些要求可以说是进步的，相反，由于他们放弃了政党间“不搞政治妥协”的准则，这些要求可以说是退步的。他们在与全国（革命者）合作时最热心要求的是如下各项[11]:

1.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2.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3. 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4. 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

5. 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6．要求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全国的、省的、地区的、市的和其他各级议会选举中有无限制之选举权，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

7．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

A、改良工人待遇：

a.废除包工制；

b.八小时工作制；

c.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

d.工厂保险；

e.保护女工和童工；

f.保护失业工人。

B、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

C、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

D、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

E、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

F、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

在这些要求中，最触目的是承认蒙古、西藏和新疆的独立与自治。中国的军阀想以武力统一这些地区，这将进一步维护封建国家，对此，共产党自然要强烈反对。"至于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不然"，二大宣言⑫说，"这些地方不独在历史上为异种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因为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业、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而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以这些不同的经济生活的异民族，而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

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并且于本部人民没有丝毫利益。”他们所要求的是首先使蒙古、西藏和新疆各以其固有的经济背景实行自治，再联合它们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

（3）共产党员在议会中如何行动？

二大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把过去规定的共产党员应如何对待象议会这种政治团体的意见颠倒过来了。共产党希望党员在议会中谋求席位，以便能够利用这种地位开始在资产阶级中进行宣传。

“中国共产党”，他们主张，“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所以应当跑入这类时常被封建的武人势力所胁迫、破坏的议会中去，高声告发代谢不穷的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所扶植的武人政治的罪恶。”⑬同时，它应当在各级议会中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而斗争，以反抗本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的一切压迫。⑭

（4）共产党根据什么原则领导工人运动？

在二大，他们着重于工人运动的集中、扩大和正当的领导。他们把领导工人运动看作是自己的基本任务。他们承认，中国的工人运动仅处于初级阶段，还很难摆脱旧行会和手工业工会的束缚。运动不具备普遍性，只有偶发的行动。训练做工会工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所采取的原则可归纳如下：⑮

1 中国共产党决定集中力量以影响那些可能产生的工会的工人，如铁路工人，海员，五金工人，纺织工人等。

2. 工会是保护工人利益的机构。它要使工人享受他们所生产的产品。

3. 工会必须明了和承认，雇主与雇员之间没有共同的利益。

4. 工会应努力改善工人的状况。

5. 应制定足以威胁雇主与政府的劳工立法。

6. 工会应为国家独立、公民权利与自由而斗争，并应在与其他革命者的联合战线中占有独立而重要的地位，但对无产阶级来说，领导自己是很重要的。

7. 为了发展工会，共产党人不能单独行动，而应帮助一切被压迫的阶级。

8. 工会要确立两个重要原则。一个是集体合同的力量，另一个是承认“同工同酬”。“同工同酬”不是要把高工资降低向低工资看齐，而是要提高低工资向高工资看齐。

9. 工会的性质与行会大不相同。雇主不得成为会员。但应说服一切工资收入者加入，工会中没有性别、年龄、宗教、地位、种族、国籍、政治见解、技术熟练不熟练的歧视。

10. 工会是战斗的工会，不只是保障福利的机构。它的主要活动是同资本家和暴虐的政府作斗争。

11. 每个工会都必须有一所学校，以教育会员，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

12. 每个工会的结构必须迅速纳入紧密团结的、集中的和有训练的产业工会。

13. 工会在组织上的第一个措施是建立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应为领工资者的组织，不离开工会而独立。

14. 真正的工会应由阶级的意见一致和系统的纪律来维持。要使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在任何特殊工会中工人之间不得闹磨擦，在全国，工会之间不得发生冲突。

以上这些就是二大所采取的原则。现在让我们看看共产

党与工会的关系。共产党是一切有阶级觉悟的分子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先驱，它有明确的纲领，其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在为工人的利益而斗争中，它准备在任何时候都与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基督教实行合作，但必须明了，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

最后，共产党指出，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统一的工会联合会在向世界资本主义作斗争。世界革命工会的统一的联合会是“红色工会国际协会”，中国共产党准备在国际工会的旗帜下组织中国的工会。

（5）共产党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的关系是什么？[16]

这次大会还有两项决议案，是与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有关的。

关于青年运动，他们承认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性，并决定与该组织合作。这意味着什么？随着机器生产的进步，幼弱劳动者成了必需的。在许多企业中，少年劳动大军和成年工人一样，成了机器的重要附属品。资本家对待这些少年工人普遍比对成年工人更苛刻。千万个劳动阶级的青年受资产阶级的剥削，然后又在每次内战或侵略战争中被驱使，以维护资产阶级真正的压迫。

世界经济秩序已被帝国主义所破坏。资产阶级现正仿效帝国主义者，剥削他们本国的工人和弱小国家，以恢复1914年以前的经济状况。在反对这种措施的斗争中，首先倒下的是青年工人。在中国，外部帝国主义压迫和内部的封建军阀压迫决定了青年共产主义者所要采取的立场。凡是青年工人受剥削的地方，就是青年共产主义者积极活动的地方。中国青年运动不应只为青年工人的经济和文化利益而斗争，不应只将他们组织到共产主义和青年国际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队伍中

去，而应当聚集于为民主联合战线而斗争的一切革命力量中去，并引导他们进行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到劳工群众中去”是青年共产国际的口号，中国的青年共产主义者应当遵循。

现在我们来讨论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决议说，数世纪来，平等与自由的原则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文明国家装饰门面的词句。在经济条件不平等的制度下，妇女如何能得到平等与自由？她们只不过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劳动市场的廉价生产奴隶。此外，她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还必须忍受母职和家务的重负。自国际资本主义进入中国，无产阶级妇女已降低到工资奴隶的地位，为了低廉的工资，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受着不人道的待遇。在现存秩序中，无产阶级妇女业已经受了极残酷的折磨。还有许多妇女，她们以前并不属于劳动阶级，现在为经济条件所逼迫也已成为劳工，更何况中国妇女被封建礼教所禁锢，过着娼妓般的生活。至于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全国一切阶级的妇女都被剥夺，则是普遍状况。所以中国共产党现时关于妇女问题的要求是：（1）帮助妇女获得公民权，政治权利和自由；（2）在工业中保护妇女儿童；（3）推翻旧礼教和旧传统的束缚。

读者或许会想起，1921年底在莫斯科曾召开过一次革命者国际大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变动，无疑就是由于那次会议。中国共产党不仅使他们自己与国民党联合，而且引导工人、青年和妇女参加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它的“不搞政治妥协”的政策。国民党如何，它采取何种方案，将在下一章加以讨论。

第 五 章

国民党的新计划及其最近的趋向

虽然许多外国报纸的作者把国民党领袖孙逸仙博士看作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但我却认为他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为了找出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一下孙博士1922年所写的《中国的国际开发》这本书。[17]

最近这次世界大战一宣布停战，他就执笔写这本书，并试图给中国制定一项新计划。他的计划可概述如下：

1、交通之开发

A、铁路十万英里

B、碎石路十万英里

C、修浚现有运河：

（a）杭州天津间运河。

（b）西江扬子江间运河。

D、新开运河：

（a）辽河松花江间运河。

（b）其他运河。

E、治河：

（a）扬子江筑堤浚水路，起汉口迄于海，以便航洋船直达该港，无间冬夏。

（b）黄河筑堤浚水路，以免洪水。

（c）导西江。

（d）导淮。

（e）导其他河流。

（f）在全国建设更多的电报、电话及无线电系统。

2、商港之开辟

A、于中国中部、北部、南部，各建一大洋港口，如纽约港者。

B、沿海岸建种种之商业港，及渔业港。

C、于通航河流沿岸建商场船埠。

3. 铁路中心及终点，并商港地，设新式街市，各具公用设备。

4. 水力之发展。

5. 设冶铁制钢，并造士敏土之大工厂，以供上列各项之需。

6. 矿业之发展。

7. 农业之发展。

8. 蒙古新疆之灌溉。

9. 于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建造森林。

在开始开发计划时，他提出注意重要的四点：

（1）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

（2）必应国民之最急需要。

（3）必期抵抗之至少。

（4）必择地位之适宜。

孙博士认为，这一计划不仅有助于中国，而且也有助于世界。他说："中国拥有四百二十八万九千平方英里之土地，四万万人口，以及世界上最丰富的矿藏和农业资源，当

今乃军国主义及资本主义列强猎获之对象……是一块较巴尔干半岛为大的骨头。中国问题若不和平解决，将有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之危险，较上次更为可怕的世界大战将无可避免。为解决中国问题，我建议中国的广大资源根据一项社会主义计划由国际开发，一般说是为了世界，特殊地说是为了中国人民。我的希望是，这样做当今势力范围即可废弃；国际资本竞争即可避免；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资本与劳动间的斗争当可免除。”威尔逊总统已提出通过国际联盟的干预，结束未来的武力战争，并提出在对中国的开发中以互助合作结束贸易战争，由此根绝未来战争的最大根源。

这种计划如何才能实现？对此，孙博士热忱欢迎外国资本。他最后说：“当吾计划弁首之部寄到各国政府与欧洲和会之后，巴黎遂有新银行团之成立，思欲协助中国发展天然物产。闻此举之发起人，出自美国政府。故吾等即当开办之始，亦不患资本之无着也。”他所希望的是使中国的一切大工业都归人民所有，他主张：“故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人民公有；但须得国际资本家为共同经济利益之协助。”

在这种国际发展计划中，他大胆地提出对世界三大问题的实际解决办法，这三大问题是：国际战争，商业战争，阶级战争。

为要结束国际战争，他指出德国的悲惨命运。具有侵略野心的德国，其资本与利益丧失殆尽，还有其他难于计算之物。法国虽以战胜称，实际也是一无所得。既然中国现在业已醒悟，下一次来自日本的侵略，定会遇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他还说，列强因合作所得到的利益与好处，要比以斗争所得到的多。渴望为和平而创建中国的中国人民，衷心欢迎

这一新银行团，如果它愿意实行孙博士计划所列举的原则的话。这样做，各国的合作就可得到保证，为个人利益和民族利益而进行的武力斗争就会永远停止。

在倡导结束商战即竞争的主张时，孙博士说，这种战争的后果对于被击败的对手来说，其有害和残酷并不亚于一场武装的冲突。亚当·斯密的学说认为，在健全的社会制度中，竞争是有利的因素。但现代经济学家则发现，竞争是浪费的和破坏性的。事实上，现代经济的趋向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即向着集中而不是向着竞争的方向发展的。私有的联合企业尽量提高物品价格，使公众无法忍受。正当的补救办法是使工厂归全国人民所有。如果将中国工业组成一个巨大的企业联合，归人民所有，那么在世界的这个最大的市场上，商业战争就会一劳永逸地被消除。

如何结束阶级战争？孙博士认为，最好不要走西方文明的老路。现代文明的目的不是私利，而是公利，达到此目的的捷径，不是竞争，而是合作。他在自己的计划中提出，此种实业发展的利润，首先应支付投资其中的外国资本的本息；第二，付给劳工以高工资；第三，改善与扩充生产工具。除这些规定外，利润的其余部分，应采取降低一切商品和公用事业价格的办法给予公众。一句话，他的想法是以资本主义创建中国的社会主义，使人类进化中的这两种经济力量并肩为未来的文明服务。

以上所述，就是孙博士的新纲领，一言以蔽之，他的最新计划就是要发展中国，使它取得西方强国的地位。为了进一步说明国民党的思想，最好是研究孙博士的思想。最近二十年来，孙博士倡导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了维护民族主义，他推翻了满清政府，光复了中国

本部的民族。为了维护民权主义，他创建了中华民国，以保证人民的自由。至于民生主义，他解释说，这将在社会主义之下建立，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之下建立。他在回忆录中说："我自逃脱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的魔爪以后，即计划在欧洲停留，以考察欧洲的政治和风俗习惯。我在这里停留的两年期间，增加了不少知识，开始理解民权的真实意义。当今的欧洲并未使人民有真正的自由，故社会改革的先驱者正在奋斗，提出要进行社会革命。中国如采取我所倡导的达成社会改革的方法，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得到保证。"我们虽不相信孙博士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但它无疑可能达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尽管他把自己的主义解释为社会主义，但共产党却认为他是民主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参加他的党，不过是从民主主义的观点出发，并非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中共二大决议案有一段话[18]说："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在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之下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内外两层压迫之下无法得着自由而又急需得着自由的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不如此无产阶级便无法得着为自己阶级开始团结所必需的初步自由……民主派[19]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

参加与民主派联合的联合战线，是（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和决定的。

其计划[20]写道："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这种会议何时召开，计划如何实现，无人知晓，但在1922年7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所有党员都加入国民党。这种宣告实质上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共产党同时还发表了一个宣言，说明与国民党合作的理由和必要性，而共产党的《前锋》杂志则开始为民族主义进行宣传。

就我们所知，对这些思想以前从未作过详细的说明。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后，国民党修订了它的纲领，并对孙博士所提倡的三民主义作了详细的解释。三民主义简述如下：

（A）三民主义。

1. 民族主义。在现有民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中华民族的国家，以实现民族主义的国家。

2. 民权主义。实现民权，政治平等和男女平等，并使人民得到以下权利：

a. 选举权。各级议会议员和地方官吏均由人民以直接普选产生。

b. 创制权。地方立法机构不能制定或修改人民所提请的某种法律时，人民可合法集会或投票创制，

c. 复决权。某项议案虽被地方立法机构表决或否决而认为不适宜者，人民可合法集会再次表决。

d. 罢免权。各级议会议员或地方官员认为某官吏不忠于职守时，人民可合法集会，表决将其罢免。

3、民生主义。

为避免劳资之间的不平等，并协调社会之不平等，发

展人民全部资源的政策的第一个步骤如下：

a.建立国家工业。属于全体人民的工业，应置于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之下。

b.平均地权。应制定土地法、有关分配土地及征收地价税的法律，以平均地权。

c.保护劳工。应制定法律，保护和改善工人农民福利。

（B）五权宪法。

1.立法机关制定各项法律及监督财政之权。

2.司法部门审理各种诉讼之权。

3.行政部门实行管理之权。

4.监察官吏及各级议会议员之权。

5.考试文官并决定其任职之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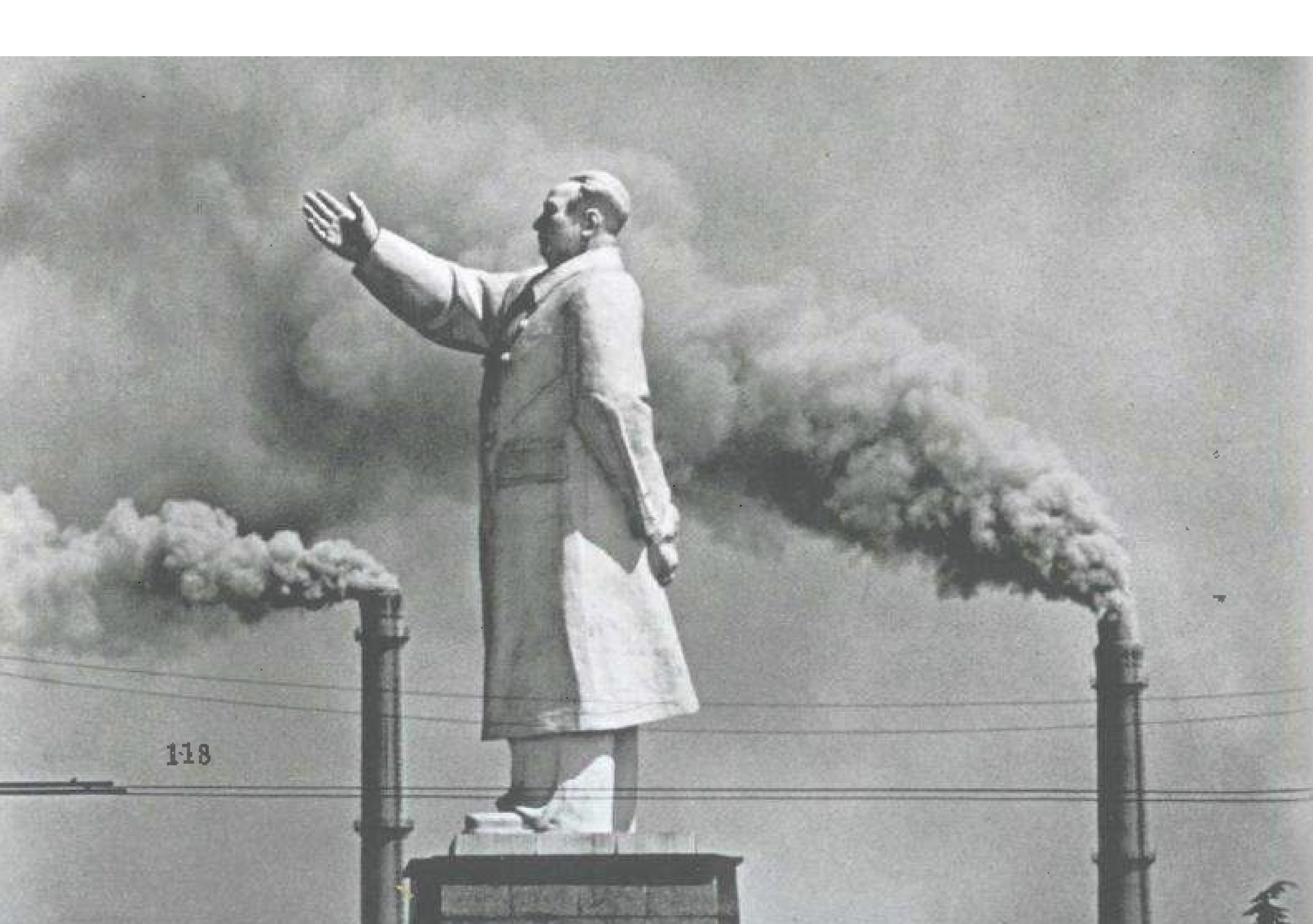
孙博士负责最后两权。

1911年以后，孙博士改变了关于扩大民族主义范围的态度。起初，他把民族主义的含意限定在中国本部，现在他要承认满洲、蒙古、西藏和新疆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国民党同时组成了两个委员会或部，管理有关农民、工人和妇女的事务。工人农民委员会的职责是调查外国工人农民的状况，蒐集改善中国工人农民状况的建议。妇女委员会的职责是调查国内外妇女的状况，探求帮助中国妇女的办法。

这种改革计划就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之后的计划。孙博士无疑是希望把中国推向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但这与共产党所采取的主义根本不同。过去两年，谣传孙博士趋向赤色组织并与俄国结盟，这不过是中国外交界和资本家因猜忌和偏见而引起的一种怀疑。就我所知，孙博士从来就不希望把

中国变成赤色的。事实上，民族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二者是无法混同的。共产党人所以希望与民族主义者合作，是因为民族主义或许能够改善无产阶级的状况。孙博士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提倡通过“赤色”手段进行的改革。

这两个政党的合作无疑是值得未来的历史学家注意的重要而伟大的变化。现在这两党既在华南也在华北进行着斗争。他们的计划能否实现，这有赖于两党的坚持和耐心。至于未来的结果，谁也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得等待时间作出回答。



第 六 章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结论

可能会提出这种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能保持多久，能走多远。尽管他们暂时实现了联合，但两党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就各不相同。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后者否定私有权，前者承认私有权。后者抗拒国际资本主义，前者接受国际资本主义。后者承认蒙古、西藏与新疆的独立，前者拒不承认此种独立。后者所提倡的革命的一个特点是，革命应当是国际的，而前者的革命则仅仅是民族的。

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孙博士的政府所在地广州举行。与第一次大会相比，这次大会的决议和政策没有多大变化，但发表了一个对国民党不甚满意的宣言，并指摘了国民党所已采取的某些步骤。考虑到世界的和中国的政治经济特点，考虑到中国社会不同阶级的悲惨境遇及其要求，他们仍旧坚持，国民革命是必要的，但对国民党只注重军事行动而轻视对民众的宣传表示不满。

宣言写道："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不幸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1）希望外国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

依赖外力，灭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2）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因此，中国国民党不但要失去政治上领袖的地位，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

“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但在我写这篇论文时，旧金山的一家中文报纸发出一则电讯，说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被广东政府禁止。此后再未看到详细报道，但如果此消息属实，那末两党的合作就会停止，他们之间的鸿沟今后或许就会加大。

事实上，共产党已阐明，他们所以与国民党联合只是为了获得暂时的利益；他们最终是要分裂的。共产党经常告诫工人们，一方面他们不仅应当参加国民革命阵线，另一方面也应当斗争，以改善自己的状况；之所以参加国民党阵线，是因为工人阶级可以得到政权，而与国民党联合，只不过是一种策略。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应当参加和援助国民党，但决不是向它投降，或仅仅变成它的附庸，因为国民党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的政党。相反，应当把无产阶级……集合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独立地为自己的阶级而开展运动。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不应忘记自己的独立的组织。

就政治斗争而言，他们必须参加国民党，但在劳工运动中，他们必须保持独立的态度。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组织的工会里面活动，不得任意引导工人脱离已成立的工会。我们的战术是要在他

们势力下的工会里面，渐渐积成势力，推翻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的领袖地位，自己夺得领袖地位。”

因此，两党的最后分裂对共产党人来说是十分清楚的。下面的这段话指出了这一点：“革命胜利后国民党将以他们从封建主义者手中夺得的政权，很自然地趋向于压迫无产阶级。同时，无产阶级的力量将决定于他们在革命时期所能养成的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他们之间友谊的破裂迟早将会来到，但现在说这种破裂已经开始则为时过早。在国民党胜利的时候，他们就要与共产党破裂。预言一个突然的变化是轻率的，这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对于描述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这也许就足够了。他们能取得多大的胜利，取决于帝国主义者给中国造成的痛苦的深刻程度。据我看，欧洲对华关系的目的主要不是建立友好关系，而是利用中国，不择手段地达到自私的目的，其动机是“海盗式的而不是和平的”。我们无须多说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文明军事入侵，只说最近的和会，很难指出那一次对弱者是公正的。难怪美国国务卿休斯先生说，“即使是最好的外交手段（会议），也没有魔力能处理强国的信念。”

在中国，每一次会议似乎就是一次新灾难的根源。列强愈会晤，中国的灾难愈增加。1919年的巴黎和会，正象梅特涅导演的维也纳会议一样，无疑是一次反动的会议。中国被任意摆布，好象它是一个被战败的敌国。山东作为礼物让给了日本，日本的二十一条件也被列强安然接受了。小国都提出三倍的尖锐的抗议，但无人给予任何注意。11月份，全世界对一切抱着多么热切的希望啊！世界将被改造；各国都将是公正豁达的；战争将被废除！但到1月份，却起了多大的变化！新的军国主义和新的军事同盟体系，比旧的还要坏。

事实上，正如中国共产党所正确指出的，巴黎和会是一次分赃会议，会上德国的殖民地被移交，近东和远东的势力范围被重新划分。

接着就是华盛顿会议，休斯先生在会上提倡六项政策，即：（1）门户开放，（2）保持中国为一完整的整体，（3）按共同原则声明与其他强国合作，（4）以和平为目的，通过会议和协商与其他强国合作，（5）限制海军军备，（6）限制要塞和海军基地。然而所有这些政策又如何特别有助于中国呢？不论会议在其他方面如何成功，它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决非令人满意的。六处租借地的三处依然无限期地保持在英国和日本手中，即使要归还给中国的其余四处也还在考虑中，审议月复一月地拖延，又要求特别赔偿费并以赎金赎回其他各种特权。领事裁判权的废除也只有因特殊目的而被指派的国际律师委员会要作出有利于它的报告时才能生效。1923年1月以后，外国邮局仍保留在各租借地和外国租界，虽然在此日期以后其他外国邮务机构将从中国领土撤走。关税限制依然强加于中国，税率按价增加到百分之五，如果厘金或省际运输税被废除，以及奢侈品加附加税百分之五，则再加百分之二点五的附加税。

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然而他们的宣言写道[21]，“英国[22]在战后的欧洲市场日被排斥，生产过剩，经济恐慌，故以发展远东市场为救济的唯一道路，而又陷于与日本冲突日见紧张的地位，同时又发生一个重大的问题：英国还是继续与日本同盟来垄断远东的权利呢？还是和美国联合来实现共同侵略远东呢？在这种纠纷之下就产生了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认为的是，要从新分配他们在远东的市场，希图调解那不可免的日、美和英、美的

两种冲突。远东问题在英帝国主义者看来，是他许多掠夺殖民地问题中间的一个，所以英美战争，或许可以久延时日，但是在日本乃只有这个唯一的大市场，在美国也只有这个唯一可供发展的大市场，所以日、美冲突万难减轻，而战争必在最近期间内爆发无疑，华盛顿会议那能为力呢？不过他们在爆发之前，拿远东——特别是中国——的丰富物产和劳苦群众，搁在各国集于华盛顿的外交家银行家的晚餐席上，平均各个的贪欲，从新宰割一次罢了。

“华盛顿会议所以标榜减轻军备，完全是要欺骗在军备负担底下呻吟而将起来革命的劳动阶级。军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柱石，资本主义国家不但需要他来侵略弱小民族，且需要他来镇压本国劳动阶级的反抗，因此，资本主义国家裁减军备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些主力舰吨数比例和陆空军备保持的竞争，愈现出帝国主义者怎样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计划压迫劳动者的阴谋。

“华盛顿会议中之主要问题——中国问题，是在美国胁制之下解决的结果，他们承认日本在满、蒙和东部西伯利亚独占的掠夺，将中国置在他们共同侵略的‘门户开放’政策之下。美国之所以采用海约翰以来之旧调，完全是要借着这个‘开放’来打破日、英在中国的优势，让他们插足进来，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门户开放’政策的采取，显然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步成功。多少年来驾驭中国的英日同盟虽是废了，但这次成立英、美、日、法的四国吸血同盟——虽然他的根基极不稳固——却要做比他加倍有力的侵略。美国所领导的新银行团，从华盛顿会议算是加了一层保障，将要使农人的中国变成向国际托拉斯进贡的藩属，从此中国的贫苦农民要纳租税给那些外国的银行，中国所有的实业要归为

外国银行的私产了。

“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因此最近的时期，是中国人民的生死关头，是不得不起来奋斗的时期。”

雷·斯坦达德·贝克先生是一位美国人，他的批评非常尖锐。他在《凡尔赛条约及其以后》中说：“如果美国希望世界有和平和良好秩序，愿意作出牺牲并冒险一试的话，它是能够成功的。因为它伟大而强有力，足以完成它所要做的几乎一切事情。但它却无所适从；它希望出现好事，但希望得不够热情。它恰似欧洲，被眼前的忧虑即眼前的自私利益所支配；它不洞察未来；它既不是真正理想主义的，也不是真正现实的。”

中国俗话说得好：“弱肉强食”。尽管帝国主义者普遍叫喊反对战争，但他们从不厌恶为剥削而增加军备。战争的形式可以有变化，但其特点还是一样的。这其间，中国经济的败落依然在继续。自1905年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金融集团之间的竞争已经缓和。日俄战争和其他事件清楚地说明，此种剥削中国的竞争，如果推进到它合乎逻辑的结论，不仅导致竞争者之间代价高昂的战争，而且要减少他们从中国人民那里榨取的经济利益。现在国际竞争已让位给一种奇妙形式的国际合作。英、法、美、日的主要金融业者结合成一种银行团。在这种制度下，各个金融集团仍受它们政府的支持，但对分摊向中国的贷款以及获取中国所应允的经济特权，却作了精心的安排。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维护中国权利或利益的任何真实意图，因为银行团的目标是银行团的经济

利益。进行新式奴役的经济方式可能使那些多愁善感的人的良心较少烦恼，但它和老的奴役方式同样有效。在这方面引用一下高等法院院长马歇尔的话是非常有趣的，他说："没有一种原则比各国完全平等的原则更为世人所普遍承认……它产生于这种平等，即没有人能够合法地将一种支配强加于他人。"他的意见是对的，可惜只适用于列强，而不适用于中国。

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十九世纪的一种产物，尤其是处于悲惨命运的人民斗争的最后手段。中国共产党的成就能有多大，取决于他们遭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加于他们的痛苦的大小。我愿在结束这一章时引用中国共产党的宣言[23]："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提高等原因，以致日趋贫困和痛苦。……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附　录　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1 9 2 1 年）

（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本党纲领如下：

A、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阶级的差别消灭。

B、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废除阶级。

C、推翻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及半制成品等，悉归社会所有。

D、联合第三国际。

（三）本党采用苏维埃形式，组织工人、农民及士兵，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本党主要政策；完全与黄色知识阶级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关系。

（四）党员不分性别和国籍；凡接受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忠实于本党者，经党员一人介绍，即可成为本党同志，但在加入本党前必须与反对本党纲领的任何政党或团体断绝关系。

（五）介绍党员入党手续：应将申请人提请地方苏维埃②审查，审查期最多为两个月，审查后经多数党员同意，申请人即被承认为党员。如该地区已成立执行委员会，则该

⑬ 党员资格应由该委员会批准。

（六）本党之主张乃至党员身分，在公开时机成熟之前须保守秘密。

（七）凡有党员至五人的地方即可组织地方苏维埃。

（八）一个地方苏维埃的党员经该地方书记正式介绍，即可转入另一个地方苏维埃。

（九）地方苏维埃党员不足十人者，仅设书记一人综理事务；如超过十人，则应设财务委员一人，组织委员一人，宣传委员一人；如超过三十人，则应成立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章程以后另行规定。

（十）各地党员人数增加时，应依照职业的不同，利用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组织，进行党外的活动，但此类组织应受地方党的执行委员会指导。

（十二）㉕地方苏维埃的财政、出版和政策，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与指导。

（十三）一地区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已设有五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应选择一适当地点，成立由全国代表会议所选十名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如上述条件尚未具备，则应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适应需要。有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详细章程以后另行规定。

（十四）党员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已得到党的同意者外，均不得担任政府官吏或议会议员。但士兵、警察和文职雇员不受此种限制。（这一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留待1922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㉖

（十五）本纲领须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代表通过修正案，始得修改。

附 录 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

（1921年）

（一）劳工组织

组织产业工会是本党主要目的。任何地方，凡有产业一种以上者，即应组织一产业工会；如某地并无大产业，而仅有一、二家工厂，则可组织适应当地情况的工厂工会。

党应向工会灌注阶级斗争的精神，如各工会所促成的政治斗争不符合本党纲领，党应避免成为其他政党的傀儡。

至于现存的同业工会及手工业工会，党可派党员加入，作为改组的初步。

会员不超过二百人时，不得成立工会。本党至少应派党员二人参加一新工会，以协助其组织。

（二）宣传

杂志、日报、百科全书及小册子均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管理。

每一地区依其需要可出版一种工会杂志、日报与周刊，以及小册子、临时通讯等。

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物，均须由本党党员直接管理和编辑。

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与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不一致的文章。

（三）劳工补习学校

因劳工补习学校为组织产业工会的准备步骤，故此种学校应于各种产业单位内成立，例如运输业劳工补习学校，纺织业劳工补习学校等。一种补习学校不得同时讲授几种不同种类工作的知识，除非此种安排确有无可辩驳的理由。

在补习学校内，只有工人才能成为管理委员会委员，管理学校事务。教师由本党聘用，但可列席委员会会议。

劳工补习学校应逐渐成为劳工组织之中心；否则不准设立，并可由本党根据情况，予以停办或改组。

补习学校教学的宗旨，其最重要者应为唤起工人觉悟，并向他们表明组织工会的必要。

（四）劳工组织讲习所

此种机构应由各种产业的劳工领导人，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和本党同志所组成，并应讲授组织产业工会的适当方法。

此种机构的目的，在于训练从事党的实际工作的工作人员，使他们特别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如组织工会，协助无产阶级开展其他各种运动，及调查工会和无产阶级的状况等。

为增进党员能力起见，本机构可按下列问题分成研究小组：劳工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各国劳工运动的现状等。研究成果可出版丛书。（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应特别注意中国的当地情况。）

（五）对现存政党的态度

对现存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和排斥的态度。在政治斗争，反对军阀与官僚，以及要求言论出版与集会自由时，凡必须表明态度者，本党应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准与其

他党派或团体发生关系。

（六）本党与第三关系的国际

党的中央机关每月应向第三国际作一报告。必要时应派一正式代表至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所在地之伊尔库茨克，此外并应派遣代表至远东各国，推进在阶级斗争中联合的计划。

附录三

中国共产党宣言

（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略）

附 录 四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

（1922年）

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

1914年大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势力已是衰萎，社会革命的势力已日见澎湃，只因无产阶级自己营盘里有许多奸贼，很下流的替资产阶级服务，变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最厉害的敌人，把这股革命狂潮暂时按抑下去了。因此，造成世界帝国主义者为恢复他们的经济起见，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进攻的情势，如各国资本家减少工人工资增加工人工作时间等。在帝国家向无产阶级进攻之情势中，第三国际召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建立一个联合的战线，共同抵御资本家目前的进攻。

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势力还是强盛的时候，是不断地向她进攻，因此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应该尽力保护苏维埃俄罗斯。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并要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为苏维埃俄罗斯也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

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

（一）现在的世界大势如下：

A、世界的经济秩序已为帝国主义的战争（1914—1918）破坏了。

B、世界的资产阶级现正向着无产阶级进攻；他们加劲来掠夺劳动者们，以图恢复他们亲身在大战中损毁了的经济秩序，无产阶级只有联合在一道战线上来反抗这个进攻。

C、在经济秩序毁坏了的世界资产阶级，又企图劫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劳力，来补偿他们在大战中的损失；因为争夺市场，他们中间发生了新的冲突，如日美间的冲突和英法间的冲突。这些冲突都是制造下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

（二）中国有殷富的天产和四万万贱价劳动力的人民，早已是世界帝国主义者们争夺之市场了，现在他们的心和眼更都着重在这个市场。

（三）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一种程度，中国资产阶级已能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反对封建制度的军阀了。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为了在中国造成他们各自更大的特殊势力，又争相扶助中国封建的军阀，使中国方兴的资产阶级的发展遭受着非常的阻碍。

（四）在这种状况之下，自1911年开始的革命势力和进行变成了十分微弱；十一年来的中国依然是重压在军阀暴横和战乱之下，致使资产阶级工商业受了阻损，不能发达；农民经受了多少不堪忍受的摧残，工人阶级的痛苦日增不已。

（五）中国本部是在军阀封建割据之下。吴佩孚一派军

阀企图以武力统一南北，现又恢复旧国会以为统一的手段，这些均不能做到南北统一。

（六）现在中国本部做不到和疆部统一，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情况和本部不同，他们互相也有差异。

（七）中国全部统一的实现，是在中国能脱离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倒封建制度的军阀，建设真正民主主义国家的时候。

（八）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认为最近要极力要求：

（1）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2）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3）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4）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

（5）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6）各种自由权；

（7）制定保护工人、农人和妇孺的法律。

（九）这些要求是与在现在情形底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很有利益的，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并力来争到他们。

（十）因此，中国工人要联合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一方面加入民主革命的战线，一方面做增进自己阶级地位的奋斗。

（十一）中国工人要联合在各种工人阶级组织之内，成功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力量。

（十二）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占第一位，我们加入民主革命的阵线，完全是以他为达到工人阶级夺得中国政权的一步过程；所以我们组织"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是我们

的一种政策。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

人类经济的及政治的进化，自然造成阶级的战争，封建时代与民主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的战争是不能免的；民主时代与共产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也是不能免的。

人类现在的历史，正在阶级战争的奋进途中，不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大部分还未得着胜利，即民主对于封建的战争也并未终了，尤其是东方产业幼稚的国家，不但在社会习俗上，即在国家统治权上，封建的势力仍然大部分存在或完全存在。在这种封建势力统治的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的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这时他们压迫的程度和无产阶级能够抵抗的程度，乃看无产阶级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所发挥的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至何程度而定。

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在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之下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内外两层压迫之

下无法得着自由而又急需得着自由的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不如此无产阶级便无法得着为自己阶级开始团结所必须的初步自由，所以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我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不是候补的革命者，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努力工作的党，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我们应该号召全世界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此种战争虽不能完全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却是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使工人农民到权力之路的第一步。同时又须告诉他们：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

的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是能够应付时势之急迫的要求的，今后更应扩大此主张，并规定进行计划如左：

A、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

B、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成民主主义左派联盟。

C、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和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一方面供资本帝国主义利用的第二国际，正立在对抗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　　*　　*　　*

第三国际之加入条件（略）[21]

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

一

在经济先进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既安然发展过好几十

年，于是与他表里为用的议会政治，也随着渐趋于巩固。在这样背景之下，无产阶级政党议会行动，就渐渐变成为投机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议会行动，换过说，就是第二国际的议会行动。德、奥、法、比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简直以全副精力集注于这种合法的哓舌的改良行动之内，而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运动及其他一切必要的违法工作抛在九霄之外。

二

第三国际产生于投机主义改良主义流血的破产之中，换过说，即产生于第二国际投降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中——重行估计无产阶级参与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民意机关”的价值；他把马克思主义上面改良主义的油烟完全抹去，阐明无产阶级议会行动的革命性质；设定无产阶级参加抛弃、退出资产阶级议会，及完全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步骤；并且把这类合法的行动完全隶属于违法的革命行动之下，至此的革命的议会行动，成为激起或辅助无产阶级一类革命风潮的重要方法之一。

三

经济落后的中国，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扶植的武人势力的宰割物和糜烂区域。因此民主革命未成功，议会政治还未确立。虽然形式上设立了各级议会，但因为武人势力的干预和蹂躏，常常处于破坏、胁迫的恐怖之中。

四

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

而奋斗的先锋军，所以应当跑入这类时常被封建的武人势力所胁迫、破坏的议会中去，高声告发代谢不穷的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收罗所扶植的武人政治的罪恶，酿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同时又在各级议会中，辩护无产阶级和贫苦农人经济生活的利益，以反抗本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的一切压迫。

五

中国共产党为实施革命的议会行动起见，按照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规定如下：

A、国会候选人名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省会、市会、县会候选人名单，由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协同提出，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所提全体或一二人不能胜任时，令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改提。

B、候选人资格不限于什么"学识"和"经验"，应尽情提出本党中最勇敢最有革命精神的劳动者。

C、本党国会议员，绝对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挥；省会、市会、县会议员绝对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员和区及地方委员会监督和指挥；一切重大政治问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以方略，本党议员之个人及团体（共产党议会团体）绝对不得自主。国会议员各项的演说稿，须预先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定；省会、市会、县会议员各项的演说稿，须预先交由中央特派员和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审定。

D、本党一切议员须利用议员不可侵犯的身分权，参与议会外一切群众运动和违法的组织。每次示威运动发生，本党议员必为示威行列的领袖，跑在群众的前面。

E、本党议员必须常常保持与群众的直接接触，每年必须

到选举他的区域往返几次，召集选民开种种会议，演说政治、经济、国际等情形及访察群众的新要求。他们在议会中的演说稿，必须用一切工人、农人、妇孺都能懂解能动听的文字，常常汇印成小册子，散布于城市与乡村。

F、本党议员不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监督或违犯中央执行委员会方针时，立即撤消其议员资格，并开除出党。

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

中国的劳动运动，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还脱不了旧行会和手艺组合的束缚。同时劳动阶级的奋斗还不过是为某种手艺或某个工厂的特别状况的单独运动，并没有普遍性质的运动。工人的组织也不强固，组合的人数也不多。切实研究这些现状，集中、扩大和正当指挥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

按照中国劳动运动的现状，和我们过去活动的经验，以及证以近代欧洲运动的教训，我们在工会运动中，应以下列各项原则为根本方针：

（一）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从资产阶级掠夺中解放自己的奋斗，必须伴着劳苦群众中的最进步和最能战斗的部分——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进行。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工会运动范围内，必须集中他的力量为产业工人的组合运动，如铁路、海员、五金、纺织工人等。

（二）工会是为什么成立的？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切身的利益和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机关，因为劳动者是创造各种物品者，所以劳动者应该享受劳动者所创造的东西。这个事实，便是工会真正的出发点。

（三）工会应该明白并且认识资本家与工人中间没有相同之点，他们中间的利益的冲突，是不能调和的。所以工会不但不要去调和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还要使这种争斗更加紧张，一个争斗接着一个争斗，在两个争斗之间工会的组织愈增强固，预备第二次争斗。如将工人的会费多数存作罢工基金是必要的，但同时工人必须避免自己立在不利地位的情况中争斗。

（四）工会应该努力做改良工人状况的运动，凡在资本主义之下能够改良的，都要努力去做。同时须使工会向着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进行，就是完全打倒工银奴隶制的资本制度，并照共产主义原则改造社会。

（五）工会进行劳动者的经济改良运动，必须进于为劳动立法运动。同时使工会明白：获得劳动立法和争得劳动改良条件，均必须工会组织得强固；在资本制度下，要能够使劳动立法或劳动改良条件真正实现，都必须劳动者的力量能够压迫政府和东家才行的。

（六）我们的同志也时常有主张工会不做政治运动的，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趋势，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此会使工会运动软弱，永远处在非法的地位。工会必须做民族独立政治的和市民的权利与自由（包括普遍选举权和废除罢工刑律的运动）的奋斗，并在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中占独立的重要的地位，这样才能促进工人们得到最后的胜利。但同时这个奋斗的用意是真正无产阶级争斗的革命宣传，不是投机主义者政治运用的用意，所以要防备非无产阶级工人们领导他们，须要无产阶级领导他们自己。

（七）固然工会可以为反对一个工头或一个雇主而奋斗，但是，工会务必把雇主看作一个阶级来对抗，或对抗工

头任意压迫工人的制度和包工制。各种运动都要变成有普遍意义，才能使工会扩大，真正变为阶级的行动。

（八）工会有两个最重要而须努力做到的职务：一种是团体契约，一种是同样的劳动要得同等的工钱。单独契约是很利于雇主掠夺的工具，他利用了这种工具便可随他的意思来进退工人和操纵劳力的卖价。工会须要努力争到：工人进退和一切待遇的条件不得由雇主向工人单独缔结，要工会代表工人和雇主协定。将工人分成了若干——种族性的、年龄和体力——种别，根据这些分别来定工钱的高低，这是资本家欺弄劳动阶级最巧妙而残酷的一种手段；资本家不但可以用这种手段去更贪婪的掠夺那些弱的和幼的劳动者，且可将劳动阶级裂成了若干利益有差的组派，要他们自相忌恨，自相竞争。工会在这种场合便须努力争到"同样劳动须给同等工钱"；不论他是洋人或华人，不论他是男子或妇女，不论他是壮年或幼孩和老头，只要他们做得是同样的劳动，便须给他们同等的工钱，不得据生理及社会的分别给他们不同等的工钱。但同时不要弄错，所谓"同等工钱"不是将高的工钱减抑了去就低的工钱，是要将低的提到和高的同等地位。这两种职务是工会的基础职务，前一者的成功，是可使工人对工会增加了信赖，吸收他们大群的加入运动；后一者的成功，是可免除工人们中间的互相冲突，做到了阶级的团结一致。

（九）工会的性质，不能与行会一样，不能有雇主在里面。同时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不论男女老少，信仰，地域，种族，国籍，政见，熟练不熟练等区别，都须加入工会，因此工会不得有收费过重或经过严重审查等办法，以限制工人的加入，这样才能使工会变成一个阶级的群众的工

会。

（十）工会最主要的活动是与资本家和政府奋斗；互相帮助，联络感情不过是次要的目的；因为工会是一个战斗的团体，不专是共济的机关。

（十一）工会自身一定要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他应当花许多时候努力去教育工会会员，用工会运动的实际经验做课程，为的是要发展工人们的阶级自觉。

（十二）工会的构造须要很快的使他成为团结很紧的、中央集权的和有纪律的产业组合。产业组合工会内部不能依职业分为一些“自治”组，因为这是会使工会成为不能战斗的破碎团体。

（十三）工会最好的基本组织是工厂委员会，每种产业下的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组织一个工厂委员会为基本单位，再组织一个产业组合。但工厂委员会须属纯粹工人的组织，绝不可用雇主和工人的代表混合组成之。同时工厂委员会又不可离工会而独立。

（十四）但是工会只是产业组合的构造，还不算最好的工会，真正的工会除了是产业组合的构造和以革命为目的以外，还须要有阶级一致和纪律的训练，就是要使全劳动阶级都联合起来，决不可有一个工厂或一部分工人的特别利益与一个产业组合的利益冲突之事发生，也须调和一个产业组合和全国劳动阶级间的利益。

（十五）各国革命的工会必须有统一的联合，去同全世界资本主义奋斗。这个全世界革命的工会的统一联合，就是赤色工会国际协会。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上面的原则组成工会带到赤色工会国际旗帜之下，同时中国劳动阶级的利益须免去同全世界劳动阶级的利益冲突的事，如提高中国工人的工

资，免得中国贱价劳力被外国资本家雇用了去排挤外国高价劳力等。

（十六）共产党与工会的区别是，共产党是所有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有一定的党纲，是一个以打倒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会是所有工人的组合（不管政治见解怎样），工人们在工会里，去接受“怎样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去奋斗”的教育，与共产党向同一目的进行，但是较缓的全阶级的组合。如战争一样，军队中有一个先锋，所有这大量的军队都跟着这个先锋前进。共产党也可说是一个人的头脑，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所以共产党无论在那种劳动运动之中，他都要是“先锋”和“头脑”，决不可不注意任何工会活动，并要能适当的诚实的和勇敢的率领工会运动。

（十七）共产党为实际率领工会和实际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必须在工会中和各个工厂委员会以及一切的劳动团体中，组织强有力的团体，很少有例外。

（十八）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所组织的工会里面活动，不得任意引导工人脱离已成立的工会。我们的战术是要在他们势力下的工会里面，渐渐积成势力，推翻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的领袖地位，自己夺得领袖地位。

（十九）为工人们目前利益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随时与国民党，无政府党，甚至与基督教合作。但是我们要随时证明和解释给工人知道：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

附加议决案

前面的议决案是关于重要产业工人的工会运动，是最重要的，现在还有几点次要的议决案，照录如下：

1.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自卫的组织，共产党须注意和活动此种组织。

2.较进步的行会里，共产党也必须进内去活动，为的是要把行会里的雇主驱逐出来，结合性质相近或同一原料作工的各种的行会，组成一个工会。

3.很守旧的行会和资产阶级为愚弄工人起见所组织的团体、俱乐部、学校等，共产党也要进去活动，在里面组织小团体。

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议决案

一

机器生产的进步，幼弱的劳力也成了可供引用的生产要素，结果在好些企业里边便加入了少年劳动者的队伍，他们同样的与成年工人成了必要的机器附件。但资本家给与少年工人的经济待遇却是普遍的都较对成年工人尤为苛酷。因之少年工人成了受掠夺阶级较更受掠夺的部分。

无产阶级少年不只成了资产阶级可榨出更大量剩余价值的目的物，且为他们驱使了去做保护他们掠夺旧的和做新掠夺的武器。每个发达到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须组织坚强的军备做他的柱石；这组织中是要有多少万鲜花一般可爱而强壮的劳动者做他的主力。帝国主义国家不但需要

军备去劫掠弱小民族，且需要他来镇压本国劳动阶级的反抗和革命。在每次战争和内乱里，组成了军队的劳动者，迫于资产阶级的驱使，疯狂一般的去屠杀他们本国和外国的弟兄们，为了资产阶级利益的保持和争夺，劳动阶级中不知有多少万鲜花一般可爱而强壮的青年生命染血在资本主义进行的历史上了。

在资本阶级这样残酷的掠夺和不害羞的利用之下，欧洲少年劳动者的先驱们举起了他们反对的旗帜，他们要勇毅的为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反对军备而奋斗。不幸，这种运动有多少年为黄色的"社会主义"者陶冶的青年所玩弄，他不曾得将他革命的光焰放高。1919年11月的柏林会议，是国际无产阶级少年痛恨帝国主义战争的屠杀而聚于百的青年的，这次会议才组成与无产阶级少年赤色的国际团结——共产主义少年国际。共产主义少年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所采用的标语是"向劳动群众中去！"他决定了各国少年劳动者奋斗的新责任；他决定了在国际共产党政治的领袖之下，独立的做无产阶级少年运动的引导。

凡是受掠夺的少年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共产主义少年要去活动的地方，要在这些地方组织他们引导他们做种种经济的奋斗；这是吸引他们归依共产主义革命队伍旗帜最有效的道路。

将资本主义世界整身推入他已挖就的坟墓，实有待于劳动者阶级认识的增加。革命的教育在无产阶级少年运动当中成了紧急需要，这种教育的重要教材就在他们日常的奋斗当中。组织的本身就要是个训练的指导师，每种运动都要是训练少年劳动者成为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的课程。

帮助世界劳动者祖国——苏维埃俄国——的赤卫军，反

对资产阶级的军备！

世界的经济秩序已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世界的资产阶级现要求加劲掠夺他们本国劳动者和弱小民族，企图恢复大战前经济原状。在这个进攻之中劳动阶级最先做炮灰的自然是最受掠夺的少年劳动者了。目前十分需要劳动的少年与成年联合成一个国际的联合战线，来反抗这个进攻。

二

天产殷富和有四万万贱价劳力人民的中国，八十年来早已成为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劫掠和争夺的目的物了；现在中国的重要经济生命已全操在外国资本家掌握之中，同时国内政治是为极反动的封建军阀们所统治。他们各据一方，为了外国帝国主义利用和各自的利益的争夺，互相战争不已。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达虽已到了使新兴的资产阶级起来反抗外国侵略势力和打倒封建制度，建设一个独立民族的民主国家的运动，但这种势力常压服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交相利用的压迫之下，从1911年至今未能成功。

这种情形决定了共产主义少年在中国最近奋斗的重要责任。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他不但要在共产主义与少年国际领导之下，为了少年劳动者经济和文化利益而奋斗，将他们组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少年军旅；他同时要联络中国一切被压迫的少年们的革命势力在一条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上，引导他们做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斗。

共产主义少年在中国的运动是要成个大群众的性质。他切要记着他是以劳动少年的利益为第一的。他要认目前民主革命的奋斗是训练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好机会，他要使革命的少年劳动者大群众的坚强的团结成了他的唯一主力。

三

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所采取的纲领和一切决议案，都是根据了实际革命需要而下的重要结论、他认为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运动中重要的一部分。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个独立的团体；关于普通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当约束在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协定之下。

为了促进两团体关系的密切和顺利协谋各种运动起见，大会认为两团体在各级组织中有互派代表的必要；至于此项职务如何实现，应由两团体中央执行委员会按实际情形协商决定。

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

一

几世纪以来，平等自由的原则，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国装饰门面的口头禅。可是在他的制度之下，经济既不平等，妇女是得不到一切平等和自由的。他们不但成为资本家用以操纵劳动市价更廉贱的生产奴隶，并且负担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家庭的和母性的负担。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下，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

现在妇女在世界上开始得着解放地位的，就只有苏维埃俄罗斯。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获得了完全平等的权利。他们业已在实际上参与改造社会的工作，与男子毫

无区别。如共产团、公共食堂、公共洗濯场、儿童养育院等都渐在建设之中，以图根本解除妇女的家庭奴隶地位。可见妇女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五年工夫所得的自由和平等，远过于妇女们在欧洲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经过一世纪奋斗的结果。这便可证明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

二

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无产阶级的妇女渐渐降到工钱奴隶的地位。他们在不堪忍受的工作状况中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不过取得比男子更低的工钱，对于女工童工的待遇，简直惨无人道。

在中国现状之下，不独女劳动者已陷在极惨酷的地位，还有许多半无产阶级的妇女，也渐渐要被经济的压迫驱到工厂劳动队里面去，就是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礼教束缚之中，过娼妓似的生活，至于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权利，乃是全国各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所以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为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的利益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他目前为妇女奋斗的是：

（一）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遍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

（二）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

（三）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

同时，中国共产党又要高声指教全国妇女们：这些运

动，不过是为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所必须经过的站驿，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妇女的真正解放是不可能的。前进，才能跑进妇女解放的正路。

三

第三国际，为一切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一切被压迫的妇女及一切被压迫的少年的世界革命的总机关，所以他的里面包括共产党妇女国际为其一部。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决定，各国共产党于他们的组织之旁设立特别委员会，以宣传广大的妇女群众，并令在各国创立一妇女部。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亦须为妇女特辟一栏。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尽快的时期内实现第三国际这种决议。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

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

（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

（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

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

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须依据左列诸原则：

（一）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集权精神和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

（二）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

（三）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四）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

（五）个个党员须牢记，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

（六）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

（七）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

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要使我们中国共产党成功为一个党，不是学会，成功为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的群众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附 录 五

中国共产党章程

（1922年）

第一章 党 员

第一条 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 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

第三条 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者，或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章 组 织

第四条 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者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指定隶属邻近之支部或直隶区执行委员会；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每一个机关或两个机关联合有二组

织以上即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定若干人为该机关各组之干部。各组组织，为本党组织系统，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加入。

第五条　一地方有两个干部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派员召集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隶属中央。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方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职权。

第六条　各区有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区召集区代表会，由该代表会推举五人组织该区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区之范围，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

第七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八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均半年；组长任期不定，但均得连选连任；干部人员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随时任免之。

第九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

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

第十条　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及各地临时发生之特别问题，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若干党员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之，此项特别委员会开会时，须以各该执行委员会一人为主席。

第三章　会　议

第十一条　各组，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各干部，每月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地方由执行委员会每月召集各干部会议一次；每半年召集本地方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区，每半年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本区代表大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

第十二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有过半数区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三条　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人数，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定之。

第十四条　凡一问题发生，上级执行委员会得临时命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

第十五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

第十六条　中央及区与地方执行委员会，均由委员长随时召集会议。

第四章　纪　律

第十七条　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

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第十八条　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

第十九条　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

第二十条　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或临时大会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第二十一条　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

第二十二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

第二十三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

第二十四条　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

第二十五条　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

（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

会之议决案；

（二）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

（三）欠缴党费三个月；

（四）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

（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

（六）泄漏本党秘密；

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

第五章　经　费

第二十六条　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

（一）党费　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

（二）党内派捐。

（三）党外协助。

第二十七条　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修改之权，属全国代表大会；解释之权属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日——23日）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附 录 六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

（1923年）（略）

注 释

说明：陈公博的论文原文无注释，所有注释，除注明为译者注外，都是编者韦慕庭加的。

①这两句话和下一段的话是引自1922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

②这段引文是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引的若干句话凑在一起的，不是一段完整的引文。——译者

③引文部分引自附录一的第三条，部分引自附录二第五条。（不是原句。——译者）

④附录三。（译文附录三略。这段文字引自二大宣言的中文原文。——译者）

⑤引自附录一。

⑥实际是第一个决议案，即附录二。

⑦实际是第一个决议案，即附录二。

⑧实际是决议案。见附录四，第134页。（这段中文引文引自二大决议案中文原文。——译者）

⑨这里英文原文是 nationalist，而不是 democrat。

⑩附录三第二部分（3）。（译文附录三略。这段中文引文引自二大宣言的中文原文。——译者）

⑪这七项要求引自附录三，第四部分（2）。（译文附录三略。这段文字引自二大宣言的中文原文。——译者）

⑫附录三，第二部分（1）。（译文附录三略。这段文字引自二大宣言的中

文原文。——译者）

⑬引自附录四第五项决议案第4条。陈的引文与他的译文不一致。（中文引文引自二大决议案中文原文。——译者）

⑭附录四的这一条中并未说明要反对幼稚的资产阶级。（这是因为陈公博将二大决议案译成英文时漏译了"以反抗本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的一切压迫"这句话。——译者）

⑮以下是附录四第六项决议案1—19条的节略。但在节略中决议案的许多重要意义都丢失了。

⑯以下根据附录四，决议案（7）和（8）。

⑰以下所述开发计划见《实业计划》。——译者

⑱以下引自附录四，决议案之（3）的第三段，略有出入。（这段中文引文引自二大决议案中文原文。——译者）

⑲此处陈公博的英文原文为 The Nationalist Party（国民党）。

⑳以下引自附录四，决议案之（3）A。

㉑以下引自附录三，但引文不完全确切。（译文有些删略。这段文字引自二大宣言的中文原件。——译者）

㉒陈公博将二大宣言译成英文时，此处译为 United States（美国）。——译者

㉓以下引自附录三，但不确切。（译文有删略。中文引文引自二大宣言的中文原件。——译者）

㉔从二大党章（附录五）看，此处可能是"地方委员会"。但陈公博的原稿，此处及第七、八、九、十二诸条的有关各处均为"地方苏维埃"（Local Soviet）故一律译为"地方苏维埃"。至于陈公博为何译成Local Soviet，则有待研究。参看本书第37—38页韦慕庭与哈泽德的论述。——译者

㉕陈公博的稿本无第十一条，可能是他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了，或在第十条以后排错了。

㉖括弧内的这句话是陈公博将文件译成英文时加的。——译者

㉗陈公博在将二大决议案译成英文时，完全略去了文件的附录——加入第三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译者

